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

計 畫 類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NSC 101-2410-H-004-130-
執 行 期 間 ：101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彭明輝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李柄佑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蕭宇辰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徐維里

報 告 附 件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公 開 資 訊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

中 文 摘 要 ：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曾經歷過一段史料無限擴張卻不讀廿五史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新派史學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東西」；舊派史學工作者則謹守傳統文獻的藩籬，呂思勉適巧是這樣一位舊派史學工作者。據資料顯示，他曾數度讀完廿五史，並據此撰寫其中國通史與斷代史。呂思勉的主要著作形式為教科書，但此時期之大學教師評等，係以專論、專題為主，而非以教科書為據。在此種學術風潮下，呂思勉以通史、斷代史、讀史劄記等形式為主的著作，顯然是有點不合時宜的。

呂思勉治學嚴謹，注重排比史料，分類劄記，長於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著作甚豐，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不下千餘萬言。且在經學、文字學、文學等面向，均有獨到見解。惟與其同時代以專題、專論為尚之學術風氣略不合拍，縱使其戮力於涉獵古文獻，並廣泛閱讀從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但似仍不為學界所重。對於這樣一位著作豐富，但著作形式與時代學術風氣立異的學者，受學界之忽略，似亦為理中之事。

本研究計畫擬全面探討呂思勉史學的各個面向，包括通史、斷代史、專書、專論與讀史劄記等。試圖從呂思勉的著作中，探析、索引其史學意涵，並將呂思勉史學放到其所處時代的學術背景中討論，探討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以論析其史學的成就與侷限。

中文關鍵詞： 呂思勉、斷代史、通史、學術風氣、現代中國史學

英 文 摘 要 ： There has been a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scholars looked for a wide range of source materials whereas ignored the twenty-five (official) histories. While the ’newfangled’ scholars searched for different sorts of materials, the ’conservative’ historians stayed in the castle of traditional sources. Nevertheless, L&uuml； Simian is a conservative. According to what has been known, he read through the twenty-five officials histories a few times, and wrot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based on those materials. His major writings are textbook-like works. However, reviews on college teachers’ academic works required those of monographs or

papers, not textbooks. Consequently, those dynastic and general textbooks and reading notes he wrote did not fit the requirements.

L&uuml； is productive. He wrote more than ten million words in Chines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His had outstanding viewpoi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etymology, and literature. His approach emphasized analyses and classifying of materials. He was good at synthesizing, achieving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 Compared to his colleagues who focused on special topics, he did not keep pace with them. Even though he endeavored to collecting materials from traditional sources, and introduc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rom the West, it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he was thought little of by contemporaries.

This project will discusses L&uuml； Simian’s works, including his writing on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monographs, papers and study notes. I shall try to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works, so as to real his achievements and limits in history.

英文關鍵詞： L&uuml； Simian, dynastic histories, general histories, academic trends,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 1/2

摘要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曾歷經一段史料無限擴張卻不讀廿五史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新派史學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舊派史學工作者則謹守傳統文獻的藩籬，呂思勉適巧是這樣一位舊派史學工作者。據資料顯示，他曾數度讀完廿五史，並據此撰寫其中國通史與斷代史。呂思勉的主要著作形式為教科書，但此時期之大學教師評等，係以專論、專題為主，而非以教科書為據。在此種學術風潮下，呂思勉以通史、斷代史、讀史箚記等形式為主的著作，顯然是有點不合時宜的。

呂思勉治學嚴謹，注重排比史料，分類箚記，長於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著作甚豐，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不下千餘萬言。且在經學、文字學、文學等面向，均有獨到見解。惟與其同時代以專題、專論為尚之學術風氣略不合拍，縱使其戮力於涉獵古文獻，並廣泛閱讀從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但似仍不為學界所重。對於這樣一位著作豐富，但著作形式與時代學術風氣立異的學者，受學界之忽略，似亦為理中之事。

本文擬全面探討呂思勉史學的各個面向，包括通史、斷代史、專書、專論與讀史箚記等。試圖從呂思勉的著作中，探析、索引其史學意涵，並將呂思勉史學放到其所處時代的學術背景中，探討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以論析其史學的成就與侷限。

關鍵詞

呂思勉、斷代史、通史、學術風氣、現代中國史學

The Novel and Conservative Aspects of Lü Simian's Historiography 1/2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scholars looked for a wide range of source materials whereas ignored the twenty-five (official) histories. While the "newfangled" scholars searched for different sorts of materials, the "conservative" historians stayed in the castle of traditional sources. Nevertheless, Lü Simian is a conservative. According to what has been known, he read through the twenty-five officials histories a few times, and wrot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based on those materials. His major writings are textbook-like works. However, reviews on college teachers' academic works required those of monographs or papers, not textbooks. Consequently, those dynastic and general textbooks and reading notes he wrote did not fit the requirements.

Lü is productive. He wrote more than ten million words in Chinese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His had outstanding viewpoi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etymology, and literature. His approach emphasized analyses and classifying of materials. He was good at synthesizing, achieving master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 Compared to his colleagues who focused on special topics, he did not keep pace with them. Even though he endeavored to collecting materials from traditional sources, and introduc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rom the West, it is not hard to understand that he was thought little of by contemporari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es Lü Simian's works, including his writing on dynastic and general histories, monographs, papers and study notes. I shall try to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works, so as to real his achievements and limits in history.

Key Word

Lü Simian, dynastic histories, general histories, academic trends,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一、引論

每個時代有其學術取向，符合此學術取向者為時代所重，不符合此學術取向者，不免消逝於天地之間。然而我們很難判斷何者真正具有學術價值，何者為乘勢而起。

1930 年陳寅恪(1890- 1969)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1]。惟此新材料需運用得當，方可成為“預流”，否則亦僅徒為“蘇州金人瑞胸中獨具之古本也”[2]。陳寅恪此處所指新材料、新問題，或謂其與陳垣(1880- 1971)皆為“預流”者也。

陳寅恪所謂“預流”，很可以為呂思勉的不為世所重做一注腳。身處強調新材料、新工具與新方法的學術氛圍，呂思勉史學的守舊，似乎已注定其當時與身後落寞之命運。史學前輩嚴耕望院士(1916- 1996)嘗謂，「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3]。雖然吾人毋須奉嚴耕望院士之言為圭臬，但在現代中國史學人物中，呂思勉之聲名顯然不及其餘三家。而陳寅恪和陳垣兩人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錢穆當選第七屆院士，呂思勉則在時代的流轉中，漸次不為世人所知，其故安在？嚴耕望院士認為，除了呂思勉的個性甘於「埋頭枯守、不求聞達」之外，有兩項因素可能是造成此結果的緣由：一、近代史學風尚偏於窄而深的專門研究，而呂思勉治學走博

---

[1]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2)，266。

[2]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266。

[3] 嚴耕望，〈序言〉，收入：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5。相關論述見：嚴耕望，〈史學二陳〉、〈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69- 181。

通周贍之路，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恰為反背，故難免於為學術界所輕忽；二、近代史學特別注重新史料的運用，包括發掘不常被引用的舊史料，甚至擴張史料至地下考古[4]。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即提出材料和工具的重要性，認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能擴張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因而發展出史料學派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照著材料出貨的精神[5]，「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並提出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觀點[6]。

在史料無限擴張而不讀廿五史的時代風氣下[7]，如呂思勉這類重要著作大抵皆取材於正史的學者，並不刻意徵引罕見之冷僻史料，其學術遭逢殆可想見。無可否認的，呂思勉守舊的這一面，在西學傳入中國後，“新史學”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其治史途徑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但似亦非完全如此，陳寅恪中歲以後的著作，史料多出自正史、《資治通鑑》與文集，卻仍享有大名。1942 年陳寅恪在〈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即自承：「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外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8]其中“自審所知”句，或為陳寅恪自省於十數年來對域外史地的研究，感其考證文章雖短小精悍、偏僻入裡，但僅限於點的突破，未能有面的建構。此固非“預流”所自待，加之頻歲衰病，遂轉入域內之史，捐棄域外史地的舊技。

除卻新工具和新材料的問題，現代中國史學朝兩橛的發展之勢，可能也影響史學工作者。余英時教授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中指出，

---

[4]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78- 179。

[5]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傅斯年，《傅斯年全集》，4(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261- 262。

[6] 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中說：「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傅斯年，《傅斯年全集》，2/5。

[7]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4(北京，2000): 151- 167。

[8]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162- 163。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係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現代中國史學卻走上分途發展之路。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9]。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回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基礎上進行討論。從余英時教授對現代中國史學所做的分析，不難理解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一部分學者向傅斯年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靠攏，一部分學者倚附馬克思主義史學。因此，遠於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的學者們，往往在夾縫中難以生存，呂思勉似乎正是這樣一位學者。

呂思勉(1884- 1957)字誠之，出身江蘇常州一個書香門第家庭，1884(光緒 10)年舊曆 2 月 1 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呂氏祖居。少時受教於父母師友，15 歲入縣學。幼年所習一如舊時士子啟蒙，廣泛閱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23 歲後專治史學。1905(光緒 31)年起從事文史教學和研究，早年執教於常州溪山小學堂、常州府中學堂，學生中有後來成為文史大家的錢穆、趙元任(1892- 1982)等人。其後在蘇州東吳大學(1907)，常州府中學堂(1907-1909)，南通國文專修科(1910- 1911)，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1911- 1914)等校任教。1914- 1919 年間，先後於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其後於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1920 年- 1925 年，即現今上海市上海中學)，上海滬江大學(1925-1926)任教，1926 年後長期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中共建國後於 1952 年進行

[9]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1- 29；此處所引在2, 4, 27。

院校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亦隨之轉入華東師範大學任教，1957 年 10 月 9 日辭世。

1923 年，呂思勉出版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顧頡剛評價此書云，中國通史的寫作，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呂思勉《白話本中國通史》出，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撰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10]。

呂思勉一生著作甚豐，讀書廣博，著重綜合研究，講求融會貫通。其治學方式與時潮所重的專家之學，乃有所異。其弟子錢穆亦重視會通之學，而與傅斯年所創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立異[11]。嚴耕望所列史學四大家中，陳寅恪、陳垣為專家之學，錢穆、呂思勉主會通之學，以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態勢而言，專家之學顯然是占上風的。

呂思勉著述宏富，一生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五部專門史，加上大量讀史箚記，一生著作約得千萬餘字。主要包括：《白話本國史》(1923)、《呂著中國通史》(1940、1945)、《先秦史》(1942)、《秦漢史》(1947)、《兩晉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7)、《歷史研究法》(1945)、《史學四種》、《中國民族史》(1934)、《經子解題》(1926)、《先秦學術概論》(1933)、《理學綱要》(1931)、《宋代文學》(1931)、《中國制度史》、《文字學四種》、《呂思勉讀史箚記》等。

200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呂思勉文集》，包括《白話本國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呂思勉讀史箚記》等六種[12]。

---

[10]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1- 82；《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1923年出版時以《白話本國史》為名；呂思勉，《白話本國史》，1-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前言〉，2；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稱此書為《白話本中國通史》。

[11] 錢穆嘗提及：「越有年，《史綱》出版，曉峯一日又告余，彼在重慶晤傅孟真，詢以對此書之意見。孟真言：『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彼亦屢言及西方歐美，其知識盡從讀《東方雜誌》得來。』」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蘭臺出版社，2000)，218。

[12] 張耕華，〈呂思勉：一位被冷落的史學大師──寫在《呂思勉文集》出版之際〉，《光明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初版於 1923 年 9 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此書除敍述歷代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社會情形之外，尤其關注與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東南洋、中西亞各國、各民族的歷史。此類與現代中國休戚相關的問題，多為後來通史著作所闕如。《呂著中國通史》上冊分門別類、系統論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歷史順序敍述政治歷史變革，其中婚姻、族制、階級、財產、衣食住行等題，均為昔往史書缺乏系統記載者。

中年以後，呂思勉曾擬訂一長期研究寫作計畫，欲以個人之力完成涵蓋中國史全程的斷代史系列，擬撰寫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1930 年代，上海開明書店約請錢穆撰寫國史長編。錢穆認為此國史長編非一般學者所能勝任，而其業師呂思勉乃撰寫國史最合適之人選。在徵得其業師的允諾後，錢穆向開明書店推薦由呂思勉承擔此一工作[13]。其所著《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餘萬字，即其斷代史寫作計畫之成果。

呂思勉的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都分上、下冊，上冊敍述政治歷史變革，包括王朝的興衰，王朝與少數民族、鄰國的關係等。下冊則敘述該斷代的社會文化現象，有類廣義的社會文化史，涉及社會組織、社會等級、農工商業、衣食住行、人民生計、政治制度、學術宗教方面。其材料大都鉤頤自正史，然其敍述並非泛泛而談或隨意拼鈔，其中包含許多作者的研究成果與獨特見解。嚴耕望院士對呂思勉的斷代史極為推崇，認為呂思勉的中國斷代史既周贍，又踏實，徵引繁富，扎實不苟，章節編排，篇幅有度，且出處分明，易可查核[14]。這四部書對先秦到隋唐五代的歷史研究有疏導開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以及史學方法方面的著作，亦均各具特色。

日報》，2006年2月13日。

[1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50- 51。

[14]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76- 181。

呂思勉的讀史箚記有類乾嘉箚記體著作，其中曾有部分編輯成書。惟已刊箚記皆有程度不同之刪節。200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呂思勉讀史箚記》增訂本，匯總呂思勉全部已刊和未刊箚記 762 條，百餘萬字，有助於吾人對呂思勉史學的更全面性了解。

在強調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學術風氣下，呂思勉這類謹守正史為尚的學者，在現代學人中似不多見[15]，難免會讓人覺得有不合時宜之譏。

目前的史學研究中，對陳寅恪、陳垣、錢穆等人比較重視，對呂思勉則相對冷落，似與其論著之豐富略不相稱。本文嘗試從學術的時代脈絡，重新審視呂思勉的史學，以釐清呂思勉史學的時代意義。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主流學統無疑較受研究者重視，所謂主流學統係指新派學者，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16]，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17]；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18]，我們發現北方主流學統的研究可謂猗歟乎盛哉。而與其對立的南方學統，相關研究可謂寥若晨星[19]。非僅與北方學統對立的南方學統受到忽視，部分

---

[15] 呂思勉曾兩次通讀二十四史，自云：「我於四史，《史記》、《漢書》、《三國志》讀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遍；其餘都只二遍而已。」見：呂思勉，〈自述學習歷史之經過〉，收入：俞振基(編著)，《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6)，232。

[16]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17]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18] 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上)──從疑古到重建〉，收入：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91- 118；杜正勝，〈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下)──無中生有的志業〉，《新史學之路》，119- 156。

[19] 截至2010年為止，筆者所蒐集直接論述南方學派的相關論著，僅得下列兩篇：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不在北方學統，又難畫入南方學統的學者，尤難突破南北對峙的學術夾縫。葛兆光曾撰文論析沈曾植的學術悲情，指出因時代的影響，類似沈曾植之類的學者，易為研究者所忽略[20]，呂思勉似亦可列入此類學者。

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21]。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則以“傳統派”稱之[22]。但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的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較獲青睞；此固有見於史學發展之主流性，以及史家在時代動盪中孜孜矻矻

1981)；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此外，筆者曾撰文討論南方學統的肇始；彭明輝，〈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初始(1911-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9(臺北，2008.05): 51-84。

[20] 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讀書》，9(北京，1995): 64-72。

[21]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2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379。

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美國漢學家 Laurence A. Schneider 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23]，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24]；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25]；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26]。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的研究基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的分析[27]；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

---

[2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2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2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2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2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論析史料學派的形成與發展[28]；Axel Schneider 教授“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性的探討[29]。在史學方面，傅斯年的具體成就有三：(1)揭櫫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宗旨；(2)在方法上發展王國維的二種證據法，力主直接、間接材料並重，並融合中西歷史語言學(philology)治史的門徑；(3)建立中國第一個具有規模的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亦成為史料學派的大本營[30]。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大陸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1933- 2006)《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31]；研究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以 Arif Dirlik 教授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為其濫觴[32]，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

---

[2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29]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30]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 1900-》，上(香港：中文大學，1986)，215。

[31]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32]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以郭沫若(1892- 1978)《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源與發展[33]；此外，以陶希聖(1899- 1988)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代表了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這部分的探討尚有許多可以開展的空間[34]。

有關現代中國史學人物的研究專著，由於資料集中，獲得較易，是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最為蓬勃者，如：王德毅教授《王國維年譜》[35]，汪榮祖教授《史家陳寅恪傳》[36]，胡映芬女士〈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37]，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究〉，康虹麗女士〈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38]，林麗月教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39]，張慧中女士〈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40]、李顯裕先生〈陳垣史學探析〉[41]、王信凱先生〈柳詒

---

[33]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34]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教授的討論頗鞭辟入裏，參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25- 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5- 331.

[35]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36]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37]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 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38] 此為康虹麗之碩士論文，發表於《幼獅學誌》，10. 2(臺北，1972. 06)，其後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 504。

[39]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 05): 475- 489。

[40]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41]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42]等。香港區志堅先生〈民國時期的「南高」史學(1915-1931)：以柳詒徵 (1880- 1956)及其學生為中心〉[43]，是少數以南方學派為論題的博士論文，資料翔實，論述肯綮，甚為學界所重。

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44]，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 1845 年迄 1945 年間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45]；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係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有所不同，而“史觀學派”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學派”中討論殷海光(1919- 1969)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46]。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無論探討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象，即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的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其分支。

現代中國史學是現代學術的一環，基本上架構於新學科體制之下。質言之，即在現代學科體制科系分野之產物。由於現代學科體制來自歐美，故爾建構於高等教育的大學科系，成為學術的必爭之地。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這種依附於現代學科體制的生態可謂表現得非常明顯。不論一個人學問如何廣博，設若未能躋身現代大學的學科體制中，其人被時代洪流所湮沒，甚或難以生存，乃理中之事。

---

[42] 王信凱，〈柳詒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宜蘭：佛光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43] 區志堅，〈民國時期的「南高」史學(1915- 1931)：以柳詒徵及其學生為中心〉(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1)。

[44]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4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46]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對許多史學工作者而言，呂思勉最重要的事跡可能是教出錢穆和趙元任兩位名滿天下的學生。錢穆在《師友雜憶》中提到，他在常州府中學堂念書時的歷史、地理老師為呂思勉[47]，這可能是呂思勉為世人所知的一條重要線索。由於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曾經歷過一段史料無限擴張卻不讀廿五史的時期，在這段時期，新派史學工作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舊派史學工作者則謹守傳統文獻之藩籬，而呂思勉適巧是這樣一位舊派史學工作者。據資料顯示，他曾數度讀完廿五史，並據此撰寫其中國通史與斷代史。且因呂思勉的主要著作形式為教科書，而此時期之大學教師評等係以專論、專題為主，而非以教科書為據。在此種學術風潮下，呂思勉以通史、斷代史、讀史箚記等形式為主的著作，難免有點不合時宜。筆者就讀大學時期，歷史系學生並沒有太多可資閱讀的通史與斷代史，記得當時即讀過呂思勉的《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30年後任教於歷史系的筆者，幾乎已看不到歷史系學生閱讀呂思勉著作。時移事往，呂思勉似乎已從這一代的歷史系學生中消失。

呂思勉治學嚴謹，注重排比史料，分類箚記，長於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著作甚豐，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不下千餘萬言。惟與其同時代以專題、專論為尚之學術風氣略不合拍，縱使其戮力於涉獵古文獻，並廣泛閱讀從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但似仍不為學界所重。他在經學、文字學、文學等面向，均有獨到見解。其全部著作，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已彙編成《呂思勉史學論著》，另有《誠之詩稿》問世。對於這樣一位著作豐富，惟因其著作形式與時代學術風氣立異，故爾受學界之忽略，似亦為理中之事。

截至 2012 年為止，有關呂思勉史學的研究，主要為兩個方向：一、學人傳記；二、學位論文(主要是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在學人傳記中，較具代表性者

[47]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47- 51。

為：張耕華教授《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呂思勉：史學大師》[48]；張耕華教授與呂思勉弟子李永圻有師生之誼，可視為呂思勉再傳弟子，且其本人與呂思勉女兒呂翼仁教授相熟，故此二書資料甚為翔實，但因師門之傳承，對呂思勉難免略有溢美之詞。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亦為傳記之屬[49]，用以探頤索引甚便，惟亦非嚴格之學術論析。俞振基(編著)《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50]，蒐錄呂思勉弟子之學記，屬懷念師恩之書。

幾本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分析呂思勉史學之各面向，惟均各有其著重之點，未能全面探討呂思勉的整體史學成就[51]。在 5 本碩士論文中，有 4 本出自師範大學，似亦為一頗堪玩味之現象。是否說明呂思勉的史學著作以教科書為主體，因而吸引師範大學研究生的目光。這方面的討論，尚待進一步分析。

有關呂思勉史學／學術之研究，臺灣學術界似乎是缺席的。截至 2012 年 12 月止，勉強或可以嚴耕望院士〈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為代表[52]，惟此文屬概論式之敘述，而非全面論析呂思勉史學的整體面貌。且嚴耕望院士為錢穆學生，即呂思勉之再傳弟子，其論述或許客觀，猶難免囿於師門之傳承。

基於有關呂思勉的研究論著，如非其弟子或再傳弟子所撰述，即為研究所碩士論文，全面探討呂思勉史學意涵之論著，似尚未之見。本文擬全面探

---

48 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張耕華，《呂思勉：史學大師》(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49 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

50 俞振基(編著)，《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6)。

51 相關碩士論文包括：(1)王婷婷，〈呂思勉通史編纂的成就及其價值〉(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2)何周，〈淺論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幾個問題〉(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7)；(3)李波，〈呂思勉與《白話本國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4)袁振堂，〈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5)陳輝娟，〈二十世紀20- 40年代中國歷史學家對中國宗族的研究：以呂思勉、陶希聖的研究為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52 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治史三書》，169- 181。

討呂思勉史學的各個面向，包括通史、斷代史、專書、專論與讀史箚記等。試圖從呂思勉的著作中，探析其史學意涵，並將呂思勉史學放到其所處時代的學術背景中討論，探討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以論析其史學的成就與侷限。

二、現代中國史學的傳統與創新

已閱畢張耕華教授所撰之兩本傳紀：《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呂思勉：史學大師》[53]；並整理呂思勉之大事編年初稿，以為未來撰寫研究報告之用。

文化霸權論

借用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論[54]。人不止是被暴力，且同樣為概念所宰制[55]。葛蘭西的主張乃起源於對「階級鬥爭」狀況的分析，「政權」會透過非武力和政治的方式，藉由種種社會文化機制，形成市民共識，使全民願意接受既有被宰制的現況。葛蘭西「霸權」在這樣的意義下，儼然就是社會文化規範和標準的推動者，它不只是一種柔性的說服手段，更經常透過複製統治階層所彰顯的社會利益，來使統治的威權暴力合法化和正當化。因此「霸權」不僅深刻織縫在日常生活紋理當中，且透過教育和宣傳，不只使人們在意識型態的呼籲與召喚中，將許多主流文化的假定、信仰和態度視為理所當然，也同時超越於所謂

---

[53] 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張耕華，《呂思勉：史學大師》(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4] 有關葛蘭西與「霸權」論，參考：Thomas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6, No. 2 (Apr. - Jun., 1975), 351-366.

[55] Thomas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6, No. 2, 351.

的政治經濟體制(如國家和市場)之外，在常民生活中形成微妙且無所不包的力量。但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認為很難用單一的主權權力來想像國家的存續，政治問題不能限定於「階級鬥爭」的面向。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綜合各種手段，可以在政治、經濟層面上進行訓練，這種訓練技巧中有某種特殊的一致性，用以調節個人行為的手段是使之服從某一形式的理性，相互作用而成為一特殊的層面[56]。在許多文化的表現形式當中，「霸權」都居於主導性的位置，它以無形的方式來建構民主國家的文化屬性和認同，因此「霸權」是無所不在的支配性意識型態。其實許多理論家都認為，「霸權」其實經常處在某種不穩定和脆弱的狀態下，不過在許多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當中，「霸權」基本上仍然持續以某種可見的形式恆久存在，「霸權」也經常在政治經濟的面向之外，如家庭、媒體與教育等分析範疇，形構其主導性的框架作用[57]。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能更進一步解釋社會文化與政權變遷的過程，並且更強調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主動性作用，可以彌補馬克思過於重視社會經濟結構的不足之處。

葛蘭西在談到知識界與文化組織形成之時，也指出具體實際上知識界許多階層，並不是在抽象民主基礎上形成的，而是適應最具體的傳統歷史過程形成的[58]。城市型的知識界是和工業一起成長的，因而與工業的命運相聯繫；鄉村型的知識分子則大部分是「傳統性」的，與農民社會環境相聯繫[59]。但葛蘭西還是認為問題的中心點還是在於確定任何基本社會集團有機知識界範疇和傳統知識界範疇之間的差別，而這種差別將可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和新

---

[56] 包亞明(主編)，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0-31。

[57]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200》(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130-131。

[58]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 144; 中譯：葛蘭西(著)、葆煦(譯)，《獄中札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4。

[59]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148; 中譯：葛蘭西(著)、葆煦(譯)，《獄中札記》，426。

的歷史研究之可能[60]。中國的特有文字，表示著知識界完全與人民分開。印度與中國的知識界和人民之間的巨大距離，甚至表現在宗教方面[61]。傅柯則認為，知識分子總是努力畫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把象徵著真理和自由的知識領域與權利運作的領域分隔開來，以此來確立、提高自己的身份[62]。要研究權力，就必須研究權力的策略、網絡、機制和所有決策賴以實施並迫使其得到實施的手段[63]。

三、治史的材料與方法

《大家小集—呂思勉集》書摘

書名：《大家小集—呂思勉集》

作者：呂思勉

編者：張耕華

出版地：廣州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 年 8 月

本集選錄呂思勉先生的文章共六十八篇，按內容分成若干組，有論史的、論文的，也有時論、遊記、回憶、自述等，部分文章則是從講義或演講稿中節錄出來，由編者另加題目。

第一組至第三組，大都屬於論史的文章。第一組收錄的八篇，都是通論性的

---

60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149; 中譯：葛蘭西(著)、葆煦(譯)，《獄中札記》，427。

61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161; 中譯：葛蘭西(著)、葆煦(譯)，《獄中札記》，435。

62 包亞明(主編)，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31。

63 包亞明(主編)，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29。

史論文章，呂思勉先生很善於對歷史作融會貫通的概括，這得益於他對中國歷史有全面而通貫的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的特點》說中國古代政治的放任主義特點；《帝制成功—君政廢墜》說大一統帝制建立以後，官僚政治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兵備的廢弛與外族的入侵》說秦漢以後，中原王朝的兵備廢弛與外族入侵的關係等；都是帶有總結性的概括，對於宏觀地把握中國古代歷史的特徵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組的八篇，主要是論述歷史人物以及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從題目上看，幾乎已是題無剩義，但呂思勉先生都能提出不同於他人的看法和評述。如《論法家》一篇，說法家雖是先秦諸子中最新穎的一派，但仍有它的落伍之處，那便是不知國家和社會的區別，而將國權擴張得過大，秦的短命而亡，與此大有關係。《論王莽改革》一篇，說王莽的失敗是先秦以來談社會改革者的共同失敗，由此顯示出古代歷史的一大轉折點，自此以後「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成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為魏武帝辨誣》、《為魏延辨誣》兩文，旨在糾正因演義平話而造成的對魏武帝、魏延等歷史人物的誤謬。《論宋武帝與陳武帝》則討論歷代政治家的度量與其成敗得失的關係[64]。

第三組的九篇，部分為近代史的內容部分屬於民族史的內容，《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論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兩篇可以與通論性的部分互相發明，都是對傳統社會整體性的概說。其說傳統社會的三個特徵(本書第131 頁)[65] ，最值得我們細細體味。《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一文，專論近世學術的變遷、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到呂思勉先生的治學宗

[64]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2。

[65] (一)當時中國的政治是消極性的，在閉關時代可以苟安，以應付近世列國並立的局面則不足。(二)當時中國的人民和國家的關係是疏闊的，社會規則都靠相沿的習慣維持，所以中國人民無其愛國觀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時，才能奮起而與國家一致。(三)中國社會的風俗習慣，都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所規定的，入近世期以後，生活情形變，風俗習慣亦不得不變。但中國疆域廣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響不一致，所以其變得遲速，亦不能一致，而積習既深，變起來自然也有相當的困難。

旨及其為人處世的態度。此外，還收錄了有關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拓殖等幾篇民族史的文章。呂思勉先生的這些史論文章，雖然論述的是歷史，但其最終的落腳點都放在現實，試圖在歷史經驗的梳理中為當下社會找到一些可借鑒的思路和方法。比如《論漢代刺史》一篇，說西漢所設的刺史是專門用來監督太守一級行政官的，他們官位比太守低，資格比太守淺。這種用小官去治大官的做法，遂引發當時人「刺史該不該改州牧」的爭論。改為州牧，就算是太守的上級官，可用資歷較深的人去擔任。歷史上的制度設置和議論，對於兩千多年後的今人，有何價值和意義呢？呂思勉先生說：「西漢的刺史設置，仍有相當的價值，而當時人的議論則不足取。因為，行政與監督本為兩個系統，行政官宜用資格較深的人，監察官宜用資格較淺的人。因為行政有時候要有相當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當的技術，這是要有經驗然後才能夠有的，所以要用資格深的人。至於監察官，則重在破除情面。要鋒說，不要穩重。要有些初出茅廬的呆氣，不要閱歷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遠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慣了以為無足為怪。要他到處沒有認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際多了，處處覺得為難。以現在的事情來比喻，學校裡初畢業的人，文官考試剛錄取的人，宜於做監察官。在官場上辦過若干年事情的人，宜於做行政官[66]。」這一番議論，完全是為當下的社會而發，希望現實政治的設置及施行，能從歷史中獲得某些啟示或借鏡。這與純粹選取一些歷史上的遺事趣聞，寫成飯後談資式的歷史文章，立意、取經全然不同。

第四組的六篇，都是談論史學和史學方法的文章。呂思勉先生談史學方法也有他的特色。《史籍舉要》原是在瀋陽高師為學生做的一次演講，實在是指導學生閱讀傳統史籍的一份詳盡的書目。提要呂思勉先生對傳統典籍做過系統而深入的研讀，其對史籍的介紹及閱讀的先後順序，都出於自己的研讀心得，如說正史雖然重要，但不易先讀，讀史當「以先續編年、記事本末、

[66]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3。

通考為便」，這就與一般的泛泛而論不同。《史學上的兩條大路》將專業治史者與一般職業青年乃至民眾讀史受益視為史學上的兩條大路，這在一般的論學文章中也是很少見的。其實民眾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對社會的影響也大。該文的目的是鼓勵大多數的職業青年及一般民眾多與歷史接觸，如吳下阿蒙，多讀史書，開卷有益。《舊時史學的弊病何在》專論傳統史學的弊病，其中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借歷史以維持道德等，用之太過或用之不當都有流弊等，都為前賢時人所未有論及。尼采曾在 19 世紀 70 年代寫過一本《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批評各種對歷史的濫用和誤用。呂思勉先生的上述論點與尼采在該書中的思想有相通之處。《現代史學的宗旨》一文，強調現代史學當以「求狀況而非求事實」為格言，當「重常人，重常事」，唯有知「風化」然後才能知「山崩」。《研究歷史的方法》一文，強調治史學第一要留意的是社會學的方法，以經濟為社會基礎的學說，對史學的說明也大有幫助[67]。

第五組的十篇文章大都屬於文學類。呂思勉說自己：「於文學，天分頗佳」，且「嗜好頗篤」自稱是古典主義文學的正統派。(本書第 515 頁)本組選錄的《中國古代文學概說》、《上古秦漢的文學演變》兩文，都是概述中國古代文學自韻文、散文、駢文以及唐宋以後詩詞、語文體等演變及其原因。《誦義與作義》、《人工與天籟》是《〈詩經〉與民歌》一文的節錄，因《詩經》說到「天籟」，因「天籟」說到民歌，從中可見呂思勉先生文學批評上的審美觀。呂思勉先生早年就注意民歌民謠的研究價值，曾對收集的民謠評析、圈點，寫成短文，發表在民國初年的報紙上。文中列舉的四首民歌，都出自他的收集記錄。《評劉向〈諫起昌陵書〉》《評司馬遷〈六國表序〉》原係呂思勉先生在光華大學講授「基本國文選文」講義中的兩篇，由此可見 20 世紀 30 年代先生講授國文課的大致情況，由老師選擇代表性的文章，印成講義，授課時則從文體、分段講起，並逐段評述作品的特色，其中又涉及各種文史

[67]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4。

典故或專門知識的介紹等[68]。這種國文課程的講法，對現在大學古典文學的教學仍有相當的價值。《國文教學貢疑》是呂思勉先生對當時一般國文課程教學方法的一點批評。他認為，除了將來成為專門的文史工作者，大部分學生是終身得不到舊文學之用的，與其似通非通浪費功力，倒不如將現代語與古語分開，一般學生當教他如何按現代文字把文章寫好即可。呂思勉先生對文字學也深有研究，著有《章句論》、《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和《說文解字文考》等著作。本集選錄的《關於中國文字的問題》寫於 1951 年，是為指導學生學習文字學而準備的一篇文章。此文篇幅甚小，卻提綱挈領地簡述了中國文字的演變、文字構造之法、文字增損變遷等內容，還依次開列了文字學方面的入門書。作者說到文字學習之難易問題，特別指出「依時從學，任何文字均易。時過後學，任何文字均難。」這實在是語文學習中的規律性總結。

第六組的九篇文章都是論教育和學習問題。與一般的職業歷史學家不同，呂思勉先生一生的主要工作是教師，任教的學校有小學、中學和大學，教授過的課目分屬國文、歷史、地理等二十餘種。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經常思索的不僅是學校學生的教育，更多的是對社會的青年及一般民眾的教育，不僅是學校課堂上的知識傳授，更多的是道德品行的培養和眼界心智的開發。如《學校的責任》、《教育當開發人的心思》兩文，都是希望教育能影響到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改變一般民眾盲目、因襲和無所用心狀態，希望學校能擔當起這樣的責任來。呂思勉先生認為，中國社會自秦統一之後，官僚已與民眾形成對立而成為剝削民眾的一個階級[69]，此後，社會上稍有才力的人都千方百計要擠進官僚階級，而社會下層漸漸地只剩下愚且弱的一般民眾，他們除了山窮水盡時會以暴動為反抗，大多數年代都只是坐以待斃。(本書第 12-13 頁)然而，他環顧 1940 年代當時的社會，民國建立已經三十年了，

[68]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5。
[69]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6。

新式教育的推行也有近五十年了，但一般的民眾仍是愚且弱，「要抽丁便抽丁，要徵實便徵實。人民何嘗能道半個不字？」(本書第 316 頁)對此他痛心疾首，寫了《論教育改革》一文，呼籲要有教育上的大改革，主張自然科學與人文教學不可偏廢，而人文教學的重點是公民教育，使人人能明白，生逢當今世界，我們該怎樣做世界上的一員？該怎樣做國家民族中的一員？他認為這應該是自小學至大學，以及一切成人教育、社會教育的重心。在《青年治學當眼光遠大》、《學問在空間不再紙上》和《論青年的修養和教育問題》等文章裡，他一再強調職業青年或一般學生，眼光要放得遠大，不要滿足於個人的豐衣足食，而要思考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學術是在空間的，不是在紙上的。書本的記載要和閱歷所得，合同而化，這才是真正的學問。所以人人可以就自己的閱歷所及與書本的學問相發明，而不必競競於故紙堆中討生活。《學術為國家社會興盛的根本》一文，呼籲學界要潛心學術，遁世無悶，越是時局動盪劇變，越需要我們平心靜氣地研究學問，切不可受環境的影響而粗心浮氣，結果反而冥行擿塗，招致大禍。他說：「中國近代需要科學甚極，中國近代學者的精神，其去純科學反越遠。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看似無關實際，其實此為整個民族趨向轉變的一個大關鍵。」(本書第 335-336 頁)呂思勉先生的這幾句話，與後來成為學界討論熱點的「啟蒙與救亡」、「救亡壓倒啟蒙」等問題，實有相通之處[70]。

第七組的七篇，都是呂思勉先生為倡議社會改革而寫的時論性文章。《致光華大學行政會書》包括於 1927 年、1928 年和 1945 年呂思勉先生所寫的三份致光華大學校行政委員會書，表達了他對興辦學校及社會改革的一系列建議。在前兩次致行政會書中，他已預感到時局的危機，說：「以今日中國處境之窘，遲早總不免與陵我者一戰，故學校的建設和改革都該立足於此。」他建議：一將本校的學生軍推行校外，二在學校所在的法華鎮倡議建立社倉，三建議獎勵人民多藏軍械等。關於學校計畫擴建的學生宿舍，建議建築

[70]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7。

上不必講究，土牆茅屋就可以了，一但發生戰爭，這些建築物，就不會被敵人利用了。《吃飯的革命》也是針對光華大學新辦食堂而寫的一份建議書。呂思勉先生一生很關心飲食方面的改革。他一直認為中國人在飲食方面所花的時間和精力太多，有必要做點改革，主張辦公共食堂，提議多吃雜糧和寒食。1936 年，光華大學計劃添建一所新飯堂，呂思勉先生便提議新建飯堂應與公廚性質的改革一起進行，並就公廚的規模、人員安排、衛生標準以及洗碗、煮飯、炒菜的改進方法等一一作了詳細而具體的設計，且希望這種改革由學校開始能漸次普及於社會。《如何根治貪汙》是針對當時官員貪污成風而寫的一篇時論文章。呂思勉先生認為，治理貪汙的根本之計在於：一是以多數人民來監督官吏，能使之不能作弊，不敢作弊；二是培育民眾的自治能力，讓人民自己辦自己的事。凡真正對民眾有益的事，民眾自能了解、自能樂意，且能切合實際，自行籌畫[71]。所以政府的責任在於引導、扶助民眾逐步實現自治，而不能操刀代斫、代其行事；更何況政府官員的操刀代斫往往只是藉口，實意還是遇與民爭利。呂思勉先生指出，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興的事業將會越來越多，官員從中貪汙的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多。今後無論誰來組織政府，對此都要有深切的注意，貪污問題如不能根治，那就無異於縱百萬虎狼於民間了。(本書第 414 頁)如能由此文再回讀《中國古代政治的特點》、《帝制成功—君政廢墜》、《入近世期以前中國的情形》等文，便可對中國官僚政治的貪污問題有更深切的了解。

第八組的十一篇文章，都屬於遊記、回憶和自述等一類。《義州遊記》係呂思勉先生早年所寫的一篇遊記，所記遊覽之地的歷史沿革、中朝邊境的物產貿易，以及風土人情等，全係歷史學家的眼光。呂思勉先生所寫遊記不多，存者尤罕，且此文如今也成為一份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文中說：「新義州街市甚寂寥，然布置規劃，亦極整齊。華人聚居處謂之中國街，入之，則湫隘囂塵，不潔之狀，匪筆能罄……」遊記中附錄了作者途中所作的詩數首，

[71]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8。

也可見當年先生遊興之豪放和對朝鮮歷史興亡之感嘆。呂思勉先生喜歡貓，妻子兒女也都喜歡貓，家中養過的貓甚多，其體態相貌、來龍去脈等，呂思勉先生都一一作了詳細的紀錄。1936，年即抗戰爆發的前一年，在繁重的教學著述之餘，呂思勉先生也偶有閒情，《貓友紀》一文便是在這時候寫成的。文末所附的〈隨筆三則〉，其中一則由貓及人，其離別、生死之命運的背後是時局、人事的變遷，讀之不勝唏噓。《青年時代的回憶》、《新年與青年》和《窖藏與古物》都是呂思勉先生寫於 1938 年至 1940 年間的回憶文章[72]。《青年時代的回憶》回憶青年時在江浦時的生活，文章寫得清新自然，可看作呂思勉先生白話文上的代表作。《新年與青年》一文，因年節而想到少時的過年情形，因過年而說到年節的設定，歲首的推演，年節、歲首的由來，帶有濃濃的史學味道，而目的還是勉勵青年以理智駕馭事物，而不做事物的奴隸。《窖藏與古物》是由一則有關發現財寶的報導而引發，作者回憶起自己的外曾祖母不取不勞而獲的故事，又論述古物之不可寶、不足寶，感慨世人多將有限的時間、精力花費於此，如其為人之本性？豈不哀哉！《兩年詩話》、《蠹魚自訟》和《連丘病案》都寫於抗戰年代，是當時呂思勉先生一家生活及其時社會的真情實錄。抗戰爆發後，光華大學停辦，呂思勉先生便回到常州老家，在城外鄉下游擊區的中學任教。從這時起，呂家的生活進入了最困難的時期，物價飛漲，供給不足，家人連連患病，在鄉下中學任教，來回奔波勞累不堪。但盤旋於先生頭腦中的，並不是經濟生活上的困難。環顧四周，一切也因戰爭而發生了變化，到處都是鳩巢鵲占，墮落的墮落，頹廢的頹廢，只覺得風俗人心墮落甚速。他想到的是讀書的為利為害，感慨這世界何以這般多事：「世界上所以有大事，正和我們的屋子，住了一年要大掃除一次一樣。灰塵、垃圾，都是平時推積下來的。推積了一年，掃除自然費力了。怎樣才能使它不推積起來呢？天天掃除，使其絕不堆積，或者也並非辦法，誰又能按著堆積的情形，決定掃除的次數，並把它排列在適當的日期，

[72]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9。

使掃除也成為生活的節奏呢？屋子住了一年要掃除，是沒人反對的，而且大多數人認為必要。社會上推積著千萬年的灰塵、垃圾，卻贊成掃除的人少，反對掃除的人多，甚而至於把灰塵、垃圾，視為寶物，死命地的加以保存。世界之所以多事，豈不以此？」(本書第 470 頁)《狗吠》一篇寫於上海淪為孤島時期，其時呂思勉先生用「野貓」、「六庸」等筆名[73]，寫成《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跡》等一系列揭露日寇暴行、伸張民族正義的文章，《狗吠》為其中之一。本組最後一篇《自述》是 1952 年呂思勉先生參加學校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後的學習總結。對於從舊時代過來的老學者、老教授，此類學習總結不僅是要自我批評，更多的是要能自我矮化、自我抹黑，唯有如此，方能在運動中過關。但呂思勉先生的這份總結，寫得不亢不卑、坦坦蕩蕩。上面叫他檢討貪汙行為，他說自己生平未曾經手財物，可劃入貪污行為的，一是有時缺課不補，照拿工資，二是為稿酬而寫不願寫的文章，這可算是思想上的貪汙。上面叫他就教學、著述兩方面加以檢討，他說：「教學上高深之學理，以淺顯之言出之，講授時亦能之。但將所授之內容，減低程度，亦嫌不足，向持中道而立。說著述多依附學校講義而行，故中多普通材料。現甚想將其刪去，全留有獨見之處，卷帙可簡什七，即成精湛之作矣。……今自檢點，於願先生殊愧望塵，於餘家差可肩隨；又說自己對《道藏》還未曾讀過，今後仍希望能加以研究，予如研究，不敢望大有成就，必能透出一線曙光，開後人研究之途徑也。」(本書第 533 頁)這份學習總結，幸虧當年呂思勉先生還存有底稿，遂留下一份呂思勉先生自撰的傳記資料，也是現代史研究的一份珍貴史料[74]。

《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章摘

研究生姓名：袁振堂

---

[73]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10。

[74] 呂思勉(著)、張耕華(編)，《大家小集—呂思勉集》，11。

學科及專業：歷史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研究方向：中西史學理論與方法
導師姓名與職稱：楊春梅教授
論文完成時間：2008 年 4 月

主要觀點：

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學術淵源來自於深厚的國學基礎，再加上時代的薰陶沉澱而形成的。

呂思勉歷史觀的主要方面是他的進化史觀，而馬克思史觀的唯物史觀對其有一定的影響。

呂思勉從研究對象、範圍、內容和任務等幾個方面，對作為一門學問的歷史，即歷史學作出了定義。現在看來，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他在揭示歷史進化的原因時，尚停留在它的因果關係，還沒有論及隱藏在因果關係之後的經濟原因。

呂思勉對歷史學社會功能的理解，呂思勉認為歷史學具有認識現在和預測未來、借鑒、經世致用等功能。

呂思勉的史學觀認為歷史總是在不斷地重寫之中。

呂思勉針對舊史的弊病提出批評，他認為舊史的弊病，一是偏重政治；二是偏重軍事，過度崇拜英雄；三是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的心，用之太過；四是借歷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常常違背了歷史的「真」。這些弊端都應該去掉，否則不利於史學的建康發展。

呂思勉提出治史者應具備豐富的知識儲備和較高的精神素養，治史過程要循序漸進，要經過材料的蒐集、考證之後，方能進行歷史書籍的編纂。在治史方法上，他提出要「重常人，重常事，不知風化，焉知山崩」，講學問不宜預設成見，要以科學的觀點為指導，要注意學與術之別，要利用中外歷史比較研究法等等。

本文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淵源。

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別以呂思勉的歷史觀和呂思勉的史學方法論，兩個方面對呂思勉的史學思想進行闡述和評論。

第四部分，是對呂思勉史學思想的評價。(原文第 2 頁)

學術淵源：

國學基礎

與同時代的史學大師相比，呂思勉不僅沒有胡適、陳寅恪負笈海外的經歷，甚至連顧頡剛、傅斯年那樣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機遇都沒有過。在他 23 歲立志治史時，所受的教育從內容到方法都是傳統式的。這種教育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目錄學的知識：

從初能讀書起，呂思勉系統閱讀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經、史、子三部與集部之半，做過六本筆記。(原文第 10 頁)

小學與經學的基礎：

呂思勉認為，小學經學功夫不僅解決了欲讀古書必先識字的問題，而且為後來研治古史運用材料，導啟了門徑，培植了初基。

文學的修養：

呂思勉少時先後過錄了前三史的點評本，點讀過《三國志》，閱覽了正續《古文辭類纂》。他說：「在古代，史學與文學關係較深，必能略知文學的

風味，然後對於作史者的意旨能夠領略[75]。」對文學的瞭解，包括訓詁、文法、文章學等內容，他認為自己的古文根基即培植於對《古文辭類纂》的熟讀。

史學的訓練：

第一層面為史料的累積。呂思勉在 14 歲以前先後點讀完《綱鑒易知錄》和《御批通鑒輯覽》，16 歲起相繼閱讀了《通鑒》、《通典》、《通考》和《通志二十略》。到 23 歲立志治史時，已將二十四史通讀一遍。通過對編年、政書、紀傳三大系列史籍廣泛系統的攻讀，他對前代歷史和史料已了然於胸了。第二層面是讀史禮記的撰寫。呂思勉在累積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撰寫了 100 多萬字的禮記。這些禮記，有的是對史時的考證，有的是對文獻資料的訂誤，更多的是對史事的分析研究，由於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禮記都曾一再補充修改[76]。

第三層面為方法的領悟。少時，呂思勉跟隨父親讀《日知錄》與《廿二史箚記》。他說：「前者貫穿群書，並及於身所經驗的事實；後者專就正史之中提要鈎玄組織之，以發明湮晦的事實的真相，都為現在治史學的好模範[77]。」(原文第 11 頁)

時代的薰陶

呂思勉在總結其一生思想變遷歷程時，認為自己曾經歷了三次思想變遷。

欽佩康梁、嚮往大同：

---

[75] 呂思勉，《史學四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7。
[76] 張耕華，〈呂思勉的史學特色〉，《歷史教學問題》，2003，第6期，21。
[77] 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3。

呂思勉童年時最信奉儒家的學說，嚮往社會大同。對於康梁的大同及張三世之說深加欽佩。章太炎也是呂思勉敬仰的人物之一。在康、梁、章三位先生當中，梁啟超的著作對其治學有著啟迪性作用。他說：「梁先生之著述殆無不寓目者。粗知問學，實由梁先生牖之，雖親炙之師友不逮也[78]。」

信服法家

大約從 17 歲以後，呂思勉的思想經歷了一次變化，進入了他思想的第二期。此時的呂思勉雖然信服法家思想，但是他說：「大同之希望及張三世之說，此時並未放棄，只不過不暇作深遠之思考，但以改善政治，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耳。」他又說：「法家的長處，在於最能觀察現實，不是聽了前人的議論，就終身誦之。法家的學說，在先秦諸子中，是最新穎和最適合時勢的。但是，法家的學說也有其落伍的一面。秦始皇在兼併天下以後，不改變原來的政策，仍以法家學說來治理國家，這是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服膺馬克思主義

1930 年前後，即呂思勉 47 歲前後，他的思想又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思想變化的第三期。呂思勉回憶說：「馬列主義初入中國，予即略有接觸，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與在蘇州時之舊同學馬精武君晤，馬君勸予讀馬列主義之書，余乃讀之稍多。於此主義，深為服膺，蓋予夙抱大同之願，然於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道，未有明確見解，至此乃如獲指針也[79]。」30 年代以後，呂思勉讀馬克思的書漸多。他說：「一是認識到知識之進步對於社會之改善大有裨益。人們欺詐行為是由社會組織之變壞產生的，而非由於知識之進步；二是認識到社會改革之關鍵在於階級鬥爭。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改革才徹底，世界才真能走向大同；三是認識到提倡愛國家、愛民族，這和馬列主義不相違背；四是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人類前進的方向[80]。」

---

[78] 呂思勉，《論學集林》，33。

[79] 呂思勉，《呂思勉遺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440。

[80] 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39。

(原文第 12 頁)

呂思勉的歷史觀

貫穿的一個指導思想，那就是進化史觀。

呂思勉在 20 年代初期即旗幟鮮明地表示：「現在說史，自然和從前的眼光不同，總得在社會進化方面著想[81]。」後來又進一步說：「歷史是研究整個社會變遷的。……讀了歷史，才知道歷史進化的道理。……若真正知道歷史，便知道世界上無一事不在變遷進化之中，雖有大力莫能阻之[82]。」呂思勉相信世界是進化的，後世總是比古代好，反對厚古薄今。他說：「譬如政制，斷沒有後世是專制，古時候反有所謂禪讓之理。」批評儒家不知社會進化，把三代以前描繪成黃金世界。呂思勉認為，社會上新舊事物的衝突，新的大概是合理的，因為舊的動搖了，然後新的才發生，而舊的所以動搖，就是因為他不合理。他舉例說，以新舊之論，太平天國仍代表新的，湘、淮軍人物仍代表舊的，太平天國的失敗是由於新的還未成熟，舊的還有餘力。他斷言，經過千回百折，弱的變成強的，新的總會戰勝舊的。(原文第 13 頁)

呂思勉用科學的眼光考察我國社會的變遷，他十分重視社會的漸變，他把這種變化比喻為「風化」，把社會的突變比喻為「山崩」，他說：「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他批評歷代史書「常事不書」的原則，提出要「重常人，重常事」，因為「常人常事」既是風化，特殊的人作的特殊的事才是山崩。

呂思勉謳歌進化，鼓吹改革，對歷代興革給以很高的評價。認為秦始皇之政皆有大一統之規模，廢分封、行郡縣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北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呂思勉譽之為「井田廢墜以後，疆理土地之一大舉」稱唐代楊炎變

[81]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82] 呂思勉，《史學四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4。

租庸調為兩稅法為良法。呂思勉盛讚王安石力排眾議，依然興革的勇氣，稱王安石是「我國有數的政治家」。認為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民感時局的嚴重，奮起而圖改革，遂有戊戌變法，後有辛亥革命，終將數千年來的君主政體，一舉顛覆，呂思勉說：「自五口通商，至民國成立不過七十年，而有如此大的成就，不可謂之不速也。」

呂思勉從 47 歲始，服膺馬克思經濟為社會基礎的學說，開始用唯物史觀闡述社會歷史的演變，他在 1928 年即說：「馬克思之說，雖受人攻擊，然以中國史實證之，可見其說正確者甚多。」又說：「馬克思以經濟為社會基礎之說，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質為基礎，以經濟現象為社會最重要的條件，而把他種現象，看作依附於其上的上層建築，對於史學的了解，實在是有很大的幫助的，但能平心觀察，其理自明。」

呂思勉以經濟為基礎來研究家族的變化，他指出：「可見，族制的變遷，實以生活為背景，而生活的變遷，則以經濟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為經濟最廣泛，和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有關係；而且其關係，是永遠持續，無時間間斷的。自然對於個人的影響異常深刻，各種上層組織，都不得不隨其變遷而變遷。」

呂思勉在分析春秋戰國時代貴族階級崩潰時說：「當時社會階級制度，是靠世祿制度維持的，貴族階級把持了社會上的大權。貴族地位優越，驕奢淫逸趨於腐敗。所以貴族階級的崩潰，其原因在貴族社會自身。這個很可以同馬克思的歷史觀點互相發明。」

在分析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係時，指出精神文明是以物質文明為基礎的，經濟發生變遷，精神也要受其影響。

由於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是社會基礎的學說，所以他的《呂著中國通史》，其編次先社會經濟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後是學術文化。在他的讀史札記中，社會經濟方面的條目相當多。(原文第 14 頁)

呂思勉的史學觀

作為一門學問的「歷史」的定義

呂思勉在其《白話本國史》和《史籍與史學》中，以探討「歷史」定義的方式作了回答。

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係者也。

史也者，所以求乎人類社會之所以然者。

史也者，所以求社會演進之遺迹，而因之推見其定則者也。

可見，呂思勉是從研究對象、範圍、內容和任務等幾個方面，對作為一門學問的歷史作出了定義。現在看來，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他在揭示歷史進化的原因時，尚停留在他的因果關係，還沒有論及隱藏在因果關係之後的經濟原因。(原文第 15 頁)

對歷史學社會功能的理解

認識現在和預測未來的功能：

呂思勉進一步指出，讀歷史對現實究竟有何益呢？他回答說：「讀了歷史，才會有革命的思想。」又說：「歷史是維新的佐證，不是守舊的護符。惟知道歷史，才知道應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所應當盡的責任[83]。」

借鑒功能：

呂思勉在歷史的借鑒作用問題上，作了不少的質疑問難，由世界上沒有真正相同的事，你偏要用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這無異於找「陳方以醫新病」，其結果沒有不失敗的。他在《歷史研究法》中有大量篇幅論述「前車不能鑒」。他不是否定歷史的借鑒作用，而是說歷史認識的不足，

[83]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35。

不了解歷史變化的道理，誤用和錯用了歷史的經驗，結果導致失敗。因此，歷史是前車之鑒，又未必是前車之鑒，這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經世致用的功能：

他提倡研究學問要為「當世效用」。他曾以「經世」為題，批評當時一些學者不關心世務，而「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忘掉了自己肩負的社會改革責任的人。他認為學問研究根本上說是由現實出發的，是為改革現實服務的。他說：「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於現實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須對於現狀，覺得不滿，然後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後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後要研究學問[84]。」他常對學生說：「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要把書上所說的事情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如此，則書本記載，和閱歷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學問[85]。他一生寫了大量的時論文章，從歷史的角度立論，倡議社會改革。(原文第 16 頁)

關於「歷史永遠都在重寫之中」的觀點

他說：「歷史上的年代如此之長，事實如此之多，即使我們所搜輯的範圍，和從前人一樣，亦不易有完備之日。何況研究的範圍，是時時變動的，無論你方法如何謹嚴，如何自許為客觀，入於研究範圍之內的，總是反映著其時代所需要…哲學家說：「世界上沒有兩件相同的東西」，因為至少他所佔的時間或空間是兩樣的。然則以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的人，看起歷史上的事件來，其觀點如何會相同？觀點不同，其所見者，亦自然不同；所覺得要補充得，要刪除的，自亦隨之而異了。所以史學一日不息，搜輯之功亦即一日而不息…何況歷史不是搜輯、考訂了便算了事的，還要編纂成書，給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隨時不同的，然則歷史安得不永遠在重作之中呢？」(原文第 17 頁)

呂思勉對舊史學的批判

---

[84] 呂思勉，《呂思勉遺文集》，412。

[85] 張耕華，《治學、修身、改革社會—略論「呂思勉的文化遺產」》，《史學理論研究》，1998，第1期，52。

這在他的《歷史研究法》和《呂著史學與史籍》中有集中地論述。

偏重政治：

他舉例說：「我們雖然知道秦代的阿房宮、建章宮宏大壯麗的情形，因而略知當時的建築技術，然究不能知秦漢時代的民居如何，其弊正在此[86]。」

偏重軍事，過度崇拜英雄：

他認為國家的興亡有其內在原因，這原因並不表現於軍事勝敗之時，而在於平時國家治理的情況，在於平時力量的積累。他說：「所謂英雄，不過善於利用時勢而已」，「英雄造時勢一語，如何能與時勢造英雄並列呢[87]？」他又認為過分崇拜英雄則會使人們產生依賴思想，忽略了自己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出現「利人濟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嘯吟風月天容我，整頓乾坤世有人」的現象。

借歷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用之太過：

他認為借歷史以激勵愛民族之心，確是一個好方法，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適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他提倡愛國，反對民族主義。他反對不顧歷史的真相而矯揉造作歷史。

借歷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常常違背了歷史的「真」：

他說：「不徒無益於求真，而反足為求真之累了[88]。」在「道德」與「真」之間做法偏激，一味的維持所謂的「道德」，從而忽略了歷史的「真」，虛構了歷史，這種做法是要不得的，不利於史學的健康發展。(原文第 18 頁)

呂思勉的史學方法論：

治史者的知識結構和精神素養

---

[86]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15。

[87]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17。

[88]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18。

研究歷史必須要通曉各科知識

他在瀋陽高專任教時，曾編寫一份《中國歷史講義》。在講義的緒論裡，列出了治史的四個要點：「一要有科學的眼光，二是考據精神，三是兼通經、子，四是參考外國史。」

社會學知識：

因為歷史是研究整個社會的變遷的。

考古學知識：

考古學研究成果具有補史、證史的功用。

文學知識：

呂思勉認為要研究訓詁、文法、義例等。因為不懂這些，就看不懂古書。

地理學：

他說：「人類無一息之間，能不受自然的影響，而地理學是一切自然條件的總括。所以治史學者，對於歷史地理，不能有相當的知識[89]。」

要有科學的觀念

第一要緊的是要知道史事是進化的，打破昔人循環之見[90]。

要知道馬克思經濟為社會基礎的學說：

他說：「以物質為基礎，以經濟現象為社會最重要的條件，而把這種現象看作依附於其上的上層建築，對於史事的了解，實在有很大的幫助的。」近代西洋科學和物質文明的發達，對史事是有很大的影響，不可以不了解。崇古觀念的由來和利弊，也要費心去研究。

古今史家的治學宗旨的異同不可不知道：

在《史籍與史學》中他指出今日史家異於往昔者，用一句話來概括：「求

[89]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30。

[90]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31。

情狀，非求事實。」因此，「重常人，重常事」以求社會之公例。

治史三階段論

材料的搜集

他認為凡是文字資料都是史料。還有非文字記載的，如實物、圖畫，他還將人類的遺骸與政俗也列入史料的範圍。關於材料搜集的方法，呂思勉主張要按一定的專題去搜集，認為：「凡搜集，必只能專於一部，或按事物性質分類，或限於時，限於地，均無不可」[91]，當務之急是做成史料匯編。(原文第 19 頁)

材料的考證

呂思勉在《史籍與史學》中，專節談到書籍、實物、古事的辨偽、考證方法。

關於書籍：

呂思勉指出，古代的書沒有全偽的，偽書也有它的用法。讀古書要先知其學術流別，可以「據文字以決書之真偽[92]」。比如近人多認為現存的《尉繚子》和《六韜》為偽書，不敢引用。呂思勉認為：「兩書皆多存古制，必非後人所能偽為。」現在山東銀雀山漢墓中出土了兩書的殘簡，足證呂思勉考證的正確。

[91]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60。
[92]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62。

關於實物：

呂思勉指出：「如能據科學論斷，最為確定，否則須注意三端。一是實物巨大，不易作偽；二是發現時有很多人觀看，不容作偽；三是不重古物之世時發現的古物較多可信。」

關於古事考證：

他列舉了十個方面。

設身處地。

注意時間、空間。

盡力搜求古事的絕對證據。

考明古事的細節。

注意記事者的道德學識及所處的環境。

進化退化之大勢，用之需極謹慎。

一時代、各地方不可一概而論。

不可據偏端抹殺其餘。

不要隨便以理推斷古事。

昔人有為言之，或別有會心之語，不可取以論史。

最後說：「搜集唯恐不多，別擇唯恐不少，此二語，固治史者所宜奉為圭臬矣[93]。」 (原文第 20 頁)

重常人，重常事；不知風化，焉知山崩

呂思勉在《歷史研究法》中，以漢朝的韓信和明朝的戚繼光兩者不同的帶兵方式為例，說明環境在事情當中的主導作用。他說：「韓信生活在漢初，

[93]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63。

上接戰國時代。戰國時代，舉國皆兵，軍隊的教育，戰鬥的技藝，是人人都會的。所以韓信帶一幫烏合之眾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取得戰爭的勝利。而戚繼光生活在明朝，中國統一已經很長時間，人民對戰爭開始變得陌生，對於戰鬥的技藝，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如果不對士兵加以訓練，置之活地，尚不能與敵人作戰，何況置於死地呢[94]？」 (原文第 21 頁)

講學問不宜預設成見，要以科學的觀點為指導

講學問不宜預設成見的觀點，是呂思勉在《歷史研究法》所提出的。

史學工作者是要知道史事是進化的，打破先前的循環論觀點

史學工作者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著社會的發展變化這一觀點

近代西方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的發達對於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盲目的尊崇古代的觀念也不得不引起史學工作者的重視(原文第 22 頁)

注意學與術之別

他以做桌子和椅子為例，他說：「如果木料不夠，你該如何去做呢？按照一定的樣子做，肯定不行，但可以變通一下，比如說桌面可以設計成正方形、長方形、圓形，桌腳可以設計成四條腿的，也可以設計成三條腿的。做桌、椅是最呆版的事，尚且如此，何況較活動的事？何況所應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所以史家治史要學會變通，不可一味的用傳統的方法去考慮問題，應換一個角度，事情便會迎刃而解，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文第 23 頁)

提倡中外比較

[94]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19。

他提倡用中外歷史比較法來研究歷史。在《兩晉南北朝史》一書中，就將這一時期的歷史與羅馬史對比研究。他指出：「東洋之有秦漢，西洋之有羅馬，其事蓋頗相類；中國見擾亂於五胡，羅馬受破毀於蠻族，其事亦未嘗不相類也。然蠻族侵凌以後歐洲遂非復羅馬之歐洲；今五胡擾亂之餘，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如故也[95]。」 (原文第 24 頁)

呂思勉史學思想的評價：

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稱呂思勉是：「以史學名家兼通經、子、集之部，述作累數百萬言，淹博而多所創獲者，吾未聞有第二人。在中國現代史學界，他創造了三個中國之最：治學最勤，著述最富，研究領域最廣。他以自己的艱苦勞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史學遺產。他的史學成就如一座高山，使後輩學人敬佩不已。」

呂思勉從來都不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服膺馬克思主義。肯定經濟分析的方法，有助於史學的了解。不過，呂思勉之服膺唯物史觀，一是由於唯物史觀與他素來信服的、嚮往的社會大同思想相符合；二是唯物史觀的經濟分析方法與他關注國計民生，著眼社會下層的考察視角相一致。

呂思勉認為：「以一種新文化，替代一種舊文化，新文化必已兼攝舊文化之長，此為辨證的真理[96]。」即謂新史學的理論、方法除了借鑒外來學術的長處，尤應吸收自身傳統的合理因素。

呂思勉 23 歲就「專意治史」，他說自己「性好考證」。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的治學方法，每讀一書，將史料輯錄下來，然後進行析解、分類、排比、考證，寫成一條條札記。經長期積累，札記總數達 100 萬字。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從札記的基礎上寫成的。(原文第 25 頁)

---

[95]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前言。

[96]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285。

他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還表現在不迷信權威，敢於向權威挑戰上。1920 年他參加《建設雜誌》關於中國古代有沒有井田制的討論，他駁斥胡適的「井田是孟子所虛構的烏托邦」的說法，肯定地指出：「曾經推行天下，綿延千載的井田自然無有；而行之於一時一地之井田，則不能謂其無有[97]。」1923 年又發表了《辨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以充分的史實對梁啟超的「鄒衍以前無陰陽五行之說」，提出不同意見。指出，陰陽五行之學起源於「古代未分家之哲學」，而「古之哲學又源於古代之宗教」。

他曾寫過《論學風變遷之原因》一文，分析學者追求名利的弊病。他說：「生平不喜歡訪問知名人士，人頗有願下交者亦多謝絕之，以泛泛訪問，無益於學問修養也。」胡適曾邀他去北京大學任教，他婉言謝絕。他說：「光華的文學院長錢子泉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離開光華等於拆他的台，我不能這樣做。」他不隨便寫應酬文章，他對他的學生說：「不要稍有名望就放棄自己長期的研究計畫，隨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寫文章或著作。否則就不免誤入歧途。結果文章發表不少，可學術上卻沒有成就。」他有一段名言，很能反映他對名利二字的態度：「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祥瑞。我願世之有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如何則可為真正的學者？絕去名利之念而已。顯以為名者，或陰以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種利，所以簡言之還只是一個利字。不誠無物；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不會得瓜；自利，從來未聞成為一種學問，志在自利，就是志於非學，志於非學，而欲成為學者，豈非種瓜而欲得豆，種豆而欲得瓜？不誠安得有物？然則學問欲求有成，亦在嚴義利之辨而已？」

嚴耕望曾從學風、世風上分析他學術成就雖高，而聲名不如三位(指陳垣、陳寅恪、錢穆)顯赫的原因，從其主觀原因來說，則與呂思勉埋頭學問遠離名利有關。(原文第 26 頁)

---

[97] 呂思勉，《致廖仲愷、朱執信兩先生公開信》，《建設雜誌》，2002，第5期。

四、通史新義

迄 2012 年 12 月止，已閱畢《白話本國史》(1923)、《呂著中國通史》(1940、1945)，並做摘要整理。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初版於 1923 年 9 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雖屬學術性專著，但因預設的讀者是青年學生，故以曉暢之白話行文。此書史識豐富，筆調流暢，數年內不斷重印再版，是 1920-1930 年代發行量甚大的一部中國通史。惟經時代之推移，史學界已鮮少提及此書。《白話本國史》的歷史分期略有別於一般所習見：周以前為上古史，秦朝統一至唐朝全盛為中古史，自唐朝安史之亂至南宋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葉為近世史，西力東漸以後為最近世史。呂思勉認為：春秋戰國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社會的一個大界限，而西力東漸是傳統社會與現代歷史的另一個大界限，其間的歷史，只是承平——致亂——再復承平的不斷重演，而無本質上的變化。但就政治形勢和民族關係而論，漢唐和宋元明清又有極大差異，故唐中期安史之亂可作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白話本國史》敍事著重橫向之連繫，由大到小，由遠至近，將所敍述的事件置於一個寬闊的時空範圍內。此書除敍述歷代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社會情形之外，尤其關注與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東南洋與中西亞各國、各民族的歷史。此類與現代中國休戚相關的問題，多為後來通史著作所闕如。《呂著中國通史》上冊分門別類，系統論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歷史順序敍述政治歷史變革，其中婚姻、族制、階級、財產、衣食住行等題，均為昔往史書較缺乏系統記載者。

《白話本國史》(1923)是呂思勉最早的中國通史著作，此後尚有分成兩階段(1940, 1945)出版的《呂著中國通史》。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0 年出版《呂思勉講中國史》[98]，惟其似未說明版本之源頭，且其內容亦與呂思勉的其他中國

[98] 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史》(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通史章節安排有異，故兩版本之異同，值得進一步比較。經由對比，發現兩種版本之差異主要為分期有異。吾人似不宜單純以呂思勉因時遷轉，導致時代分期產生變化，其中不變者為呂思勉定義中古史自秦代始，其間對近古史(從唐代始)與近代史(從明清始)之區分，以及近世史(《白話中國史》斷自明朝開國)定義的出現，以及現代史(由"革命思想萌芽"肇興)範疇定義的調整。《呂著中國通史》則採取不同的結構，以上下二編的安排，上編以中國社會中的諸種子項進行通論，下編則以中國歷史的朝代遞嬗發展為論述；以歷史的縱軸與橫軸交互對應，以利讀者理解[99]。

李波〈呂思勉與《白話中國史》〉將《白話中國史》置於當時編寫的時代潮流與學術背景中考察，探討呂思勉早年的人生經歷、個性特徵和治史風格之關聯，論析本書在撰寫過程中採取的方法及其史學特色，進而衡評本書在現代中國通史編撰中的地位與價值。

《呂思勉通史編纂的成就及其價值》章摘
研究生姓名：王婷婷
學科及專業：歷史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
研究方向：中西史學理論與方法
導師姓名與職稱：楊春梅教授
論文完成時間：2009 年 4 月

本文分為四大部分：

前言主要說明本課題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範圍以及當前學術界對該課題的研究現狀。

正文中第一章簡單介紹了呂思勉的生平經歷及其一生豐富的著述。

[99] 有關呂思勉兩本中國通史著作的差異已整理列表，因篇幅所限，此處不擬詳述，將於研究報告中進行討論。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呂思勉幾部通史著作成書的時代背景和學術背景，及這幾部通史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第三章主要闡述了呂思勉通史新編的特點，包括：通史體例、國史分期、史文的選擇、讀者群的預設、寬闊的視野及研究方法等七個方面的內容。

第四章主要闡明了呂思勉通史新編的意義及其價值。

結語部分再一次闡明呂思勉通史新編的意義和價值，並對全文研究存在的不足進行了分析，為將來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呂思勉新編通史：

《白話本國史》

1923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話本國史》是他的史學成名作，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100]。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初版時作為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也作為青年「自修適用」的通俗歷史讀物，後來被用作大學的教本，對當時的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僅 1932 年至 1934 年間就重版了 4 次。(原文第 10 頁)

呂思勉本著「把中國的歷史，就個人眼光所及，認認真真的，將他緊要之處摘出來；而有用極嚴謹的法子，都把原文鈔錄，有刪節而無改易。自己的意見，只註明於後」的原則撰寫了《白話本國史》。全書按照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組織的變化分為六個不同的時期，秦以前為「上古」；從秦統一全國到唐朝全盛期為「中古」；從唐中葉藩鎮割據起到南宋為「近古」；元、明至清中葉以前為「近世」；從西力東漸到現在為「最近世」，其中辛亥革命以後又稱為「現代」。這種歷史分期方法，是當時中國史研究中的創新見解，像史學家楊寬、黃永年等，在年青時都因受《白話本國史》的啟發而走上治

[100] 康桂英，《呂思勉與白話本國史》，《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3，第5期。

學道路。(原文第 11 頁)

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

運用進化史觀對中國遠古的歷史進行探討，在《三皇五帝時代社會進化的狀況》一節中，認為中國可考的歷史起於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漁獵時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時代，神農氏代表農耕時代，人類社會是由野蠻逐步走向文明的[101]。《白話本國史》全書都是以進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來敘述中國歷史，證明人類社會是在不斷的進化中走向發展的[102]。正因為如此，《白話本國史》成為中國史學界第一部有系統的新式通史。

《白話本國史》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原文第 12 頁)

《白話本國史》注重從社會經濟、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闡述與分析歷史發展的原因和過程

呂思勉在年輕時深受梁啟超的影響，所以在他撰寫的《白話本國史》中，積極地相應梁啟超的提議，擺脫了舊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關注政治和軍事的格局，而著眼社會方方面面，將研究目光轉向了常人常事。

強調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

《白話本國史》第一編《上古史》中有專章論述「漢族以外的諸侯」，包括照粥、東胡、貉、氐羌、粵、沿等民族，論述考證了他們的源流及變遷。此後又按照歷史順序，在各編中分別記述了每個王朝同周圍少數民族的關係。對於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同樣稱之為「朝」。不但將北朝和南朝對等

[101]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
[102]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3。

看待，還將遼、金與宋朝對等看待，有一定的章節記述遼、金的歷史，又將「宋遼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會」列為一章，一起記述。這些都反映了呂思勉民族平等的思想，並為當時在通史中記述少數民族歷史開創了新體例。

《白話本國史》以普及歷史知識，指示研究歷史的門徑為主，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對初學者十分便利。他以章節體撰成，力求避免過去史著中的條例史實、缺乏見解，極為枯燥的毛病。顧頡剛在《中國當代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文中評價說：《白話本國史》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的紀元」[103]。嚴耕望曾說，這是他讀的第一部通史。

《呂著中國通史》

《呂著中國通史》寫成於抗日戰爭時期的上海，上冊出版於 1934 年，下冊出版於 1945 年。這部書是針對當時上海大學文科學生學習上的需要而編寫的，他沒有採用一般通史的體例。上冊為文化史，分門別類地敘述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學術的發展狀況、相互關係及特點；下冊是政治史，分章按時代順序有條理地敘述了政治歷史的變革。(原文第 13 頁)

其中《財產》一章著重說明了中國歷代社會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認為中國古代存在兩大思潮，一個是儒家主張的「三世之說」，希望通過社會改革達到社會大同，進入太平世，其具體的措施是恢復井田，平均地權。一個是法家主張的節制資本，實行鹽鐵官營，控制民間商業借貸。但兩種思潮在歷史上的實踐都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果，因此他分析其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是階級時代的產物，統治者階級總是要剝削被統治者以牟利[104]。」，所以他由此推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徹底完成有利於人民的社會改革，而且還指出怎樣推行社會主義。在《實業》一章中明確指出農業的首要地位，並指出要發展農業必須改變生產方式，實行大農制，效法蘇俄的集合農場。在政治制度上，他認為應該發揚我國古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深

[103]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1。
[104]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3。

入人心，相信自古以來的「旁薄郁積的民主思想，必將待時勢的來到而見之於行動[105]」。

通過這部書我們還會發現在字裡行間都能凸現出作者獨特的思想，而且這種思想在當時是很多史家所不敢表達的。(原文第 14 頁)

立場顯明

他更多的關注民生，他自己也說過自己受康有為「大同希望及張三世之說」的影響很深，在平時就特別關注民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水利、賦稅、吏治，小到百姓的飲食起居。在資料搜集中尤其關注史籍中記載的社會各項制度的變遷。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稱《呂著中國通史》:「純從社會科學的立場批評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極多石破天驚之新理論[106]」，比如論婚姻，以男女平等唯最終宗旨，並且預言家庭制度必當改革；論財產中說道：「均貧富宗旨雖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諳現實變化之故[107]」；論政體中推崇民主原理，但同時他又感慨，在中國沒有代議政體的歷史條件下，盲目的、急遽的而成為現在的黨治而導致一系列問題。

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

他說王莽根本不能算是篡位，他的出現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發展的結果，當時的社會需要改革，王莽適時出現。既然要實行改革，就要掌握政權，要想掌握政權，自然就得自己做皇帝，為了順應歷史的發展趨勢而實行了改革，為了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他說在當時的人看來，毋寧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所以應天順人，《易·鼎掛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在當時也並不是一句話而已[108]。(原文第 15 頁)

---

105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87。
106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81。
107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94。
108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39。

非同流俗的史料觀：

取材正史

在其宗族史研究中幾乎窮盡了正史中所有的材料，例如《周禮》《禮記》《白虎通義》《左傳》《詩經》《史記》《春秋》《孟子》《漢書》《後漢書》《晉書》《北史》《南史》《宋書》《陳書》《齊書》《周書》《魏書》《隋唐志》《唐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五代史》《宋史》《明史》《日知錄》等等，基本上都來自於二十四史。(原文第 20 頁)

參校地上地下其他史料

除正史外，他還將史料搜集的範圍擴展到人類的遺骸與政俗。對於人類的遺骸，他認為「可以辨種族，識文化之由來」。對於政俗，他在《白話本國史・緒論》中表述為典章制度、風俗習慣，後來定名為法俗。他說：「有意創設，用為規範者為法，無意所成，率由不越者為俗，法俗非旦夕可變，故觀於今則可以知古」[109]。在《先秦史》的《古史材料》一章中，呂思勉曾說：「非記載之物，足以補記載之缺而正其偽，實通古今皆然，而在先史及古史茫然之時，尤為重要。」他認為鼎彝之類的實物是最重要的，其次像刀劍、錢幣、權量、簡策、印章、陶瓷器等實物。他說：「所考索者，則遍及經學、史學、小學、美術等門。或觀其興制，或辨其文字，或稽其事蹟。其所考釋，亦多有可稱」[110]。(原文第 21 頁)

---

[109] 呂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
[110] 呂思勉，《先秦史》，5。

寬廣的視野和綜合分析的方法：

《呂著中國通史》中《婚姻》一章中反駁「中國古代天然有一夫一妻之家庭」，呂思勉運用了社會學家的研究證明，人類的婚姻，開始時是沒有禁例的，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逐漸發生的加繁其禁例，即縮小其通婚的範圍，而成為今天的型態，所以「以一夫一妻的家庭為原始的男女關係實屬錯誤[111]」。在反駁「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時，參考了李安宅譯的《兩性社會學》附錄《近代人類學與階級心理》一節，他說：「猿猴和人類一樣只是人類祖先的旁支，而並不是其正系，據生物學家之說，動物的聚居，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像是貓虎之類的為家庭動物，一種是像犬馬之類的為社群動物。猿類的進化不如人類，以生物界的趨勢論，實漸走上衰亡之路，怕正以其群居本能，不如人類之故。而反說人類的最初，必與猿猴一樣，實未免武斷偏見了[112]。」再比如《秦漢史》下部講宮室的一節中，不但講敘宮殿、高樓、苑囿的建造，還說到大舍第宅的堂、室、屋、廡、廂、軒、箱、塾，說到民間的白屋、茅舍、草廬、精舍、板房以及牆垣。虎落(竹籬)、瓦磚等等，幾乎就是一篇秦政建築的簡史，這足以說明呂思勉對社會學方面的熟練掌握。

呂思勉還特別重視民族學理論的運用。他編纂了專門史《中國民族史兩種》由《中國民族演進史》和《中國民族史》合編而成。《中國民族演進史》宏觀上鳥瞰了中國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近代中國民族所受的創傷、面臨的復興之路等等，文字淺顯易懂，吸收了當時國內外的民族學理論，是供學生閱讀的通俗讀物。《中國民族史》對中國歷史上的漢、匈奴、鮮卑、丁零、貉、肅慎、苗、粵、濮、羌、藏和白種等十二個主要民族都作了系統的敘述，並附有詳盡的考證文字。(原文第 22 頁)

---

111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11。
112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13。

革新史文：

平實簡易的白話

呂思勉說：「本書(指《白話本國史》)全用白話，取其與現在人的思想，較為接近。但遇(1)文言文不能翻譯成白話處(2)雖能翻而要減少其精神(3)考據必須用原文處，仍用文言[113]。」由此可見，呂思勉並不是盲目地接受白話文，而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客觀地對待白話文。在 1920 年發表的《新舊文學之研究》一文中，呂思勉說到：「運用白話文可以使語言具有美感、突出時代性，而且更易於「行遠而傳後」；而文言文最大的弊端就在於它陳舊、不合時宜、不易流傳。但是他又指出文言文也有他獨特的優點，既能用簡潔的句式表達深刻的內涵。所以文言與白話應該取長補短，同時進行。」(原文第 23 頁)

寓論於史的文風

他說：「當其編輯之時，自古史家有一大體同守的公例，即不將自己的意思和所據的史料相雜，此即《穀梁》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亦即後世史家所謂作文唯恐不出於己，作史唯恐其不出於人[114]。」秉著這樣的著史傳統，他的史著中很少有自己的評論，也反對別人參與議論。呂思勉又說：「因為著書者必有其懸擬的讀者…若昔人所著的書，但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則並不求普通人的了解，所以其內容雖極駁雜，而精深處自不可掩[115]。」這種方式即「觀點溶於史料中」。

呂思勉的著述中，運用的文字都很樸實，讀起來似乎有點平淡味。這其

---

113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1。
114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76。
115 呂思勉，《呂思勉遺文集》，467。

實是他的刻意追求，目的是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保證史事的客觀準確。在呂思勉的《史通評》中有一段寫道：「此篇論魏晉一降，文辭華靡，採以為史，有失真實主義。…大抵華靡之文，最不宜於作史[116]。」他稱讚：「史公之文，實當時最通俗之文也。」又說：「以為正史文字古奧難懂，此乃誤解。反之，正史均是接近其實之日語[117]。」

呂思勉主張歷史與文學要嚴格區分。他說道，史學與文學，其實是屬於兩件不同的事物，文學是空想的，是感情上的產物；史學是記載歷史事實的，屬於理知的範疇。所以在人類思想還沒有完全的進步，主客觀的分別還不是十分嚴密的時代，史學和文學的關係總是很密切的，到客觀觀念逐漸顯明的時候，情形就不是這樣了[118]。在《三國史話》中他還單列了一章專門講歷史和文學。他說：「戰事是可以講的，《三國演義》式的戰事卻不能講。因為這根本是文學，而不是歷史」，文學雖然有文學的趣味，歷史也有歷史的樂趣，文學是主觀產物，是刺激感情的東西，要求在感情上得到滿足，所以閱讀文學類的著作，人們可以很輕鬆，可以只做為心靈上的慰藉，而不用太在意他是真是假，但是歷史就不同了，歷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實的，還說到：「古人的環境我們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會全部知道。古人所能做的事，也不至於全不瞭解。所以解釋古事，批評古人，不是絕對不可以，不過要很謹慎，限於可能的範圍以內罷了[119]。」 (原文第 24 頁)

五、斷代為史

《兩晉南北朝史(上)(下)》書摘

116

117 呂思勉，《史學四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20。

118 呂思勉，《史學四種》，17。

119 呂思勉，《三國史話》(上海：開明書店，1943)，30。

書名：兩晉南北朝史(上)(下)
作者：呂思勉
出版地：上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 年 7 月

前言

《兩晉南北朝史》是呂思勉的中國斷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寫於 20 世紀 40 年代初，1948 年 10 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發行。作者自謂：「《兩晉南北朝史》總論可看。此外發見魏史之偽造及諱飾，表章抗魏義民，表章陳武帝，鉤考物價工資資產，及論選舉制度皆佳。論五胡時，意在激揚民族主義，稍失其平，因作於日寇入犯時，不自覺也，異日有機會當改正」。書出版以後，呂思勉曾作過仔細的校訂；50 年代初，他整理自己的舊作，特將有獨見[120]、可成精湛之作的地方摘出，寫有札錄 1 冊。1983 年 8 月，《兩晉南北朝史》經楊寬、呂翼仁的校訂，作為「呂思勉史學論著」之一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21]。

總論

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彊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恒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為異族所服矣。五胡之亂，起於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虜，而中國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凡 273 年而南卒并於北。隋文帝雖云漢

[120]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前言〉，2。
[121]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前言〉，3。

人，然民族之異同，固非以其種姓而以其文化，此則不獨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嘗非武川族類也。《廿二史箚記》云：「兩閒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吳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內。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為周文帝。楊堅五氏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為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賜失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為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 300 餘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王氣所聚；說大落空。宋、齊、梁、陳四大之祖，生於數百里內，亦不足論。中華人事繁複，此固無甚關係也。至於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則自以當時此一區中為彊兵所在，故力征經營者易起於此，其附從之功臣，亦易出於此。不惟周、隋、唐，北齊興於懷朔，固與武川同為六鎮之一也。武川，今綏遠武川縣。懷朔，今綏遠五原縣。唐室武功，超軼漢代，然實用蕃兵、蕃將為多，與漢之征匈奴，純恃本族之師武臣力者異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據中原，雖不久覆滅，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滿州，又紛紛竊據，甚且舉中國之政權而盜之。蓋自五胡之亂至清之亡，凡歷 1,608 年。若是乎，中國民族，實不堪以兵力與異族競邪[122]？曰：否。《秦漢史》既言之矣。曰：「文明之範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羣，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野蠻之羣與文明之羣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別已微，而羣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迴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眾，弱可以為彊矣。」以文明之羣，而轉為野蠻之羣所勝，寧讀中國？馬其頓之

[122]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3。

於希臘，日耳曼之於羅馬，顧不然邪？夫黨類(class)既分，則與異族為敵者，實非舉國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權者耳。此等人，當志得意滿之餘，溺驕淫矜夸之習，往往脆弱不堪一擊。卒遇彊敵，遂致覆亡。其覆亡也，固亦與尋常一姓之覆亡無異，特覆之者非本族而為異族人耳。此時多數人民，固未嘗與異族比權量力，若為人所服，而實不可謂其為人所服也。多數人民與異族之相角，於何見之？其勝負於何決之？曰：視其文化之興替。兩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觀其孰替孰興，而文化之優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國民族之與異族遇，不以一時爭戰之不競見其劣，正以終能同化異族見其優，固非聊作解嘲之語矣。中國之見侮於異族，乃由執治理之權者之劣弱，其說可得聞與？曰：可。兩族相競，若戰陳然，居前行者，實惟政治。後漢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權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靈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歷 86 年，其紊亂可以想見。此時為舉國所想望者，莫如當時所謂名士，然其人實多好名嗜利之徒，讀《秦漢史》第十章第四節、第十四章第五節、第十八章第四節可見。此時相需最殷者，曰綜覈名實，曰改弦更張。督責之治，魏武帝、諸葛武侯皆嘗行之，一時亦頗收其效，然大勢所趨，終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國藩，承積衰極敝之餘，以忠誠為唱，以峻切為治，一時亦未嘗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後最相類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輩人，頗有志焉。然其所圖太大，不為時俗所順悅；又兵爭未久，人心積相猜忌，進思徼利，退計自全，乃不得不用陰謀以相爭奪[123]。此等相爭，正人君子，往往非姦邪小人之敵，曹爽遂為司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計私圖；景王雖為正始風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業，自不得不專為自全之計；文王更無論矣。與司馬氏相結合者，率多驕淫狙詐之徒；司馬氏之子弟，亦日習於是，而其才又日下；而時勢之艱危，人心之險詖如故；於是以晉初之百端待理；滅吳之後，又直可以有為之時；乃以趣過目前之晉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舉，皇論其他？而

[123]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2。

楊、賈、八王之禍，且代異己之誅鉏而起矣。晉室之傾頹，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初平以來，積漸所致，勢固不易中止也。夫國之所恃為楨幹者，固非一二臣衛，而為士大夫之羣，今所謂中等階級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為、有守，舊政府雖覆，樹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難。當時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國在是時，民族與國家之見地，蓋尚未晶瑩。東漢名士，看似前僕後繼，盡忠王室，實多動於好名之私，挾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國并立之時，不能為一統之益，而時或轉為其累。又既沿封建之習，則諸侯之國，與卿大夫之家，其重輕本來相去無幾，由是王室與私門，其重輕之相去，亦不甚遠；亦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國衛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劉、石肆虐，北方之名門巨族，相率遷地以圖自全，鮮能出身犯難者，由此也。夫既徒為保家全身之計，則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樂而無復報胡之心。東晉之名流，率圖苟安而怠恢復；如蔡謨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挾有姦雄之才，而又為事勢所激者，遂不恤為劣冠悔冕之行；如王敦、桓溫之稱兵。以此。夫當時北方之士大夫，雖云不足與有為，然南方剽悍之氣，固未嘗滅。觀周處可見。使晉室東渡之後，得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復，曾何足計？其時南方之人，蓋亦有圖自立者，如陳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門巨族，挾一王室之名以來，自非其所抗；而南方之政權，遂盡入北來諸族之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焉[124]。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氣始有所藉以自見，然積弱之勢既成，狙詐之習未改，日莫途遠，雖絕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復之緒矣。宋、齊、梁、陳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復名門巨族。然所用寒人，資望大淺，雖能綱紀庶務，而不能樹立遠猷。又以防如晉世之內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處之而世族之驕淫，既成恒軌，人心之傾險，又難驟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繼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倖當朝，權姦梗命，其局勢較東晉更劣，其淵源，則仍來自東晉者也。一時代之風氣，恒隨一二人之心力為轉

[124]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3。

移。當神州陸沈之餘，寧無痛憤而思奮起者？然豪桀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實亦緣其所處之境。先漢之世，學士大夫，人人有志於致用。自經新莽之喪敗，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瑣碎又遍於泥古，實不能有當於人心。其思力較沈摯者，乃思舍迹而求道。其於五經，遂束閣《詩》、《書》、《禮》、《春秋》而專重《易》；其於諸子，則弁髦名、法、儒、墨從橫而專言道。其識解自較漢人為高，然其所規畫，或失之迂闊而不能行；甚或視世事大渺小；謂有為之法，終如夢幻泡景而不足為。其力薄才弱者，則徒為自娛或自全之計，遂至新亭燕集，徒為楚囚之對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內治：則自東漢以來，不復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羣，而稍以淑己為淑羣之道。承之以釋、老，而此等見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謂淑己之道，又過高而非凡民之所知。聽其言則美矣，責其實，殆如彼教所謂兔角、龜毛，悉成戲論。此晉、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終莫能振起也。至於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以視平世，其艱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陳力於戰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廢；三五取丁等法，實為以不教民戰；而廣佔良田，規錮山澤，蔭匿戶口者，又務虐用其人。北方遺黎，或摶結立塢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摶結者太小，終難自立。其異族之竊據者，則專用其本族若他異族之人為兵，漢民既手無斧柯，則雖屢直變亂而終無以自奮。此平民所以不獲有所藉手，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也。凡此，皆晉、南北朝 300 年中，我國民不克以兵力攘斥異族之由也[125]。然則此時代中，我國民之所建樹者何如？豈遂束手一無所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與民族之動盪移徙有關，故民族之移徙，實此時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二曰地方之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閒異族之同化。四曰長江流域之：開闢。古之為治者，本今所謂屬人而非屬地，故曰「有分土無分民」。封建之世，等級之嚴峻，蓋非後世所能想像。秦人雖云父兄有天下，子弟為匹夫；漢世用人，雖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門巨族，在民間之權勢自若也。古黃河流域，蓋漢

[125]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4。

族居平地而異族居山。長江流域，初蓋江湖緣岸，亦為異族所據，後稍與漢同化，其不同風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漢之世，江、河之域，皆頗似後世之西南諸省。而江域拓殖較晚，荊楚猶火耕水耨，而揚州無論矣。自漢末以來，中原之民，乃因避亂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黨親戚，相將而行；或則有地方豪望，為之率將；故其戶數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卹，建立綱紀。觀此，可以知其為力之彊。夫在一地方積有權勢者，易一境焉，則其權勢必歸消失。北方諸族之南遷者，觀史所載廣佔良田，規錮山澤，蔭匿人戶等事，一若皆為豪富之徒，實則此不過其當路秉政者，其餘皆日入於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級漸夷，蓋非徒九品中正之廢，而實緣士族之生計日趨困窘。故與庶族通譜、通婚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與當地之民，蓋猶格不相入，故必僑置州郡以治之。其時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難削平，復我邦族，則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閭之旋反無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斷；人民亦以歲月之久，僑居者與土著者日親；而積古以來，各地方之畛域，漸次破除矣。當時河域之民，播遷所屆，匪惟江域，蓋實東漸遼海，西叩玉門，北極陰山，南踰五嶺焉[126]。其聲教之所暨被，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較彊者也。其單弱貧困者，不能遠行，則相率入山，與異族雜處。當時所謂山胡、山越者，其名雖曰胡、越，而語言風俗，實無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補戶，可見其本多漢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虛立，則又可見其多異族，因漢人之入山而稍為所化也。湘、黔、粵、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歷 1,300 年，異族之山居者，猶未盡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際，自漢末至南北朝末，僅 300 餘年而遽成其功，雖曰地勢之夷險不同，處境之安危亦異，然其所就，亦云偉矣。自有史以來，至於秦、漢，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則為漠南，自河域南徂，則為江域。論者或病中國民族，不能北鄉開拓，致屢招游牧民族之蹂躪。然民族之開拓，必鄉夫饒富之區。江域之饒富，較之漠南北，奚翅 10

[126]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5。

倍。執干戈以圉侵略，固為民族之要圖，開拓饒富之區，以增益文化，其為重大，殆又過之。江域之開拓，實我民族靖獻於世界之大勞，其始之自漢末，其成之則晉、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時代中成就之極大者也。其為功，視以兵力攘斥異族於行陳之閒者，其大小難易，寧可以道里計？惡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權，暫入異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樹，恒視乎其所處之境。自然之境易相類，人造之境則萬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後絕異，以其初自然之力彊，入後則人事之殊甚也。東洋之有秦、漢，西洋之有羅馬，其事蓋頗相類；中國見擾亂於五胡，羅馬受破毀於蠻族，其事亦未嘗不相類也。然蠻族侵陵以後，歐洲遂非復羅馬人之歐洲，而五胡擾亂之餘，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國有廣大之江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殆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勢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異之由於人事者，亦不乏焉。羅馬與蠻族，中國與五胡，人口之數，皆難確知，然以大較言之，則羅馬與蠻族眾寡之殊，必不如中國與五胡之甚。兩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則為人所同化，雖其道多端，而人口之眾寡，殆為其第一義，此中國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羅馬同化蠻族之所以難也[127]。此非偶然之事，蓋中國前此同化異族之力較大實為之。又蠻族受羅馬文化之薰陶淺，五胡受中國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榮廆、符堅、元宏，即劉聰、石虎，號稱淫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飭，其立法行政，亦未嘗不效法中國。當是時，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輩之茫昧，殆更甚於我。試觀五胡造作史實，絕無自誇其民族，祇有自誇其種姓可知。以視後來金世宗、清高宗之所為，迥不侔矣。異族之與我族遇，民族性之顯晦，遼、金之閒，殆為一大界。自遼以前，異族無不視漢族為高貴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後，則無是事矣。此其故，蓋由遼以前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內，女真、蒙古、滿洲，則皆距塞較遠也。此可見我民族同化異族之力，不待五胡擾亂，而潛移默運，業已有年矣。又不獨此也。羅馬

[127]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6。

受蠻族之侵陵，歐洲遂倒演而入於封建之世，而中國自五胡亂後，其為大一統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實由羅馬之為國，本不如中國之統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將，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蠻族酋豪，皆能成為一區域之大長，其權力歷久而不敝，既無能一統之者，則其彼此之閒，遂互相隸屬，層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國當晉、南北朝時，亦是處有豪族、遊俠；兵亂之區，又有堡塢之主；亦未嘗不專制一方，然地勢平衍，風俗大同，中樞之力較彊，民情亦習於統一，故雖有可成封建政體之端倪，卒無竟成封建政體之事實。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則羅馬之於基督，關係殊疏，而兩漢之於孔子，關係極密。政教分張，事起近世，實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篤舊，不能與時俱進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設施，固應與教化相合。羅馬之為治，實未能符合此義。人生雖不免屈於力，其意固恒欲附於德，故羅馬解體以後，歐人乃欲奉教主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實不勝其任也，而政教之分爭，遂為歐洲擾攘之大原焉。我國自漢武以後，儒教殆已成國教，然儒之所以為教者，實在人倫日用之閒兼示為政者以軌則，而非恃迷信以錮人心，故與異教之相爭不烈[128]。國家既已一統，前此各地方之宗教，僅足維繫一地方之人心者，既無以厭人之求，而急須一通行全國之大宗教，雜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變化，而成所謂道教者；而佛教亦於此時傳入。丁斯時也，所以慰悅人之魂神者，孔教則讓諸道、佛；而施於有政，以及人倫日用之際道、佛亦不與儒爭。道佛二家之閒，道家本無教義，時時竊取佛說以自附益；甚至并其儀式而竊之；一似無以自立。然舊來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剗除，佛教入中國後，雖亦竭力與之調和，或且網羅之以為己助，然佛為異國之教，於中國舊所信奉，固不能一網打盡，亦必不能囊括無遺，而道教於此，遂獲有立足之地焉。我國本無專奉一神之習，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與三教異同者，苟非顯與政府為敵；或其所唱道者，實與當時社會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維持秩序者不相容，

[128]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7。

亦未有痛加迫蹙者。獲慰悅魂神，指道行為之益，而不釀爭奪相殺之禍，要不能不謂我國之文化，高於歐洲也。

以上所說，雖已深切著明，讀者終將疑我民族之所長，偏於文事，而於武德不能無闕，請更有說以明之。韓陵之戰，齊高祖謂高昂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云何？」似乎鮮卑之戰鬥，非漢人所能逮矣。然衛操、姬澹說魏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晉人附者稍眾。及六脩難作，新舊猜嫌，迭相誅戮，衛雄、姬澹，謀欲南歸，乃言於眾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為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眾而叛。是晉人之悍戰，又過於鮮卑也。齊高祖之雄武，讀史者應無異辭，然其先固亦漢人，特久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耳。雲、代閒鮮卑，號稱悍戰者，其中之漢人，必不少也。大抵當時五胡與漢族之雜處，其情形，當略如後世之漢與回[129]。傅奕言：「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齊；故夷狄少而彊，華人眾而弱。」正與後世回彊漢弱之情形，後先一轍也。然則五胡之亂華，亦不過如清代咸、同閒西南、西北之回亂耳，惡得謂華夷之彊弱迥異，且由於天之降材爾殊哉？

晉、南北朝史事，端緒最繁，而其閒犖犖大端，為後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於缺略。又文學取其詼詭可喜，史學則貴求真，二者之宗旨，絕不相同，而當史學未昌之時，恒不免以文為累。晉、南北朝之史，帶此性質猶多。試觀有言於先者，必有驗於後。而敵國材智，所見多同，又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時史家，好法《左氏》，實則與後世平話，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據，故無俟深求也。至於行文，喜求藻飾，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則知幾《史通》，固已深譏之矣。茲編之作，鉤稽芟落，雖竭吾才，去偽顯真，猶恐十不逮一，糾繆繩愆，是所望於大雅[130]。

---

[129]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8。
[130]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總論〉，9。

《隋唐五代史(上)(下)》書摘

書名：隋唐五代史(上)(下)

作者：呂思勉

出版地：上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 年 11 月

前言

《隋唐五代史》是呂思勉中國斷代史系列著作的最後一部，抗戰勝利後開始動筆，至 1953 年才完稿，是呂思勉寫得最慢，最終未能看到其出版的一部著作。書完稿之後，一度出版無望，呂思勉任教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曾雇人抄錄一份，擬供教學參考之用。1957 年，《隋唐五代史》列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出版計劃，10 月初，呂思勉收到出版社送來的清樣，并開始校稿，10 月 8 日深夜，呂思勉肺氣腫與心臟病併發，9 日病逝[131]。1959 年 9 月，《隋唐五代史》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初版發行。由於歷史的原因，初版《隋唐五代史》刪去了原稿第一章「總論」部分，共計 14 章，部分章節標題和內容也作了刪改。1984 年 1 月，《隋唐五代史》作為「呂思勉史學論著」之一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依中華書局版重新出版。該版恢復了原刪去的「總論」部分，但未冠以第一章的序號，仍設為十四章，其他的刪節和改動之處則未作恢復[132]。

總論

[131]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前言〉，2。

[132]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前言〉，3。

論史者率以漢、唐並稱，其實非也，隋、唐、五代，與後漢至南北朝極相似，其於先漢，則了無似處，何以言之？

先漢雖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國者絕鮮，後漢則南單于、烏丸、鮮卑、氐、羌，紛紛入居塞內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據中原，猶晉世之胡、羯也。蕃、渾、党項，紛紜西北，卒自立為西夏，猶晉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據東北，與北宋相終始，亦與晉、南北朝之拓跋魏極相似，一矣。漢有黃巾之起，而州郡據地自專，終裂而為三國，唐有黃巢之起，而長安之號令，不出國門，終裂而為五代十國，二矣。不特此也，漢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則欲行均輸，筦鹽鐵，初猶相爭，《鹽鐵論》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之爭是也。至新莽遂合為一，田為王田，兼行五均、六筦是也。功雖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於衽席之安，其意則皎然也。而自魏、晉以來，人競趨於釋、老，絕不求矯正社會，而惟務抑厭其本性，以求與之相安。本性終不可誣也，則並斯世而厭棄之，而求歸於寂滅，為釋、老者雖力自辯白，然以常識論之，豈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論事，固無深遠之識，亦鮮偏蔽而去實際太遠之病，順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舉一世而欲歸諸寂滅，是教社會以自殺也。教社會以自殺，終非社會所能聽，從故至唐而闢佛之論漸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學興焉。然宋儒之所主張者，則以古代社會之組織為天經地義，而強人以順從古代之倫紀而已；人心之不能無慊於古道，猶其不能無慊於今日之社會也[133]。而宋儒於此，亦惟使人強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適屨，此與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會，而惟務抑厭人之本性者，又何以異？此又其若相反而實相類者也。世運豈真循環耶？非也。世無不變之事，亦無驟變之物，因緣相類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類，理也。然則自後漢至於南北朝，與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緣之相類者，又何在也？

---

[133]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總論〉，1。

人性莫非社會所陶甄，今世社會學家言：人類已往之社會，大變有四：曰原始共產社會，曰奴隸社會，曰封建社會，曰資本主義社會。原始共產之世，遐哉尚已，吾儕今日，僅得就古先哲人追懷慨慕之辭，想像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蓋在江、河下游？故炎、黃交戰及堯、舜所都之涿鹿，實在彭城，與今稱為馬來，古稱為越人者密邇。其爭鬥蓋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則以之為奴隸，故彼族斷髮文身之飾，在吾族則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儕之異族。苗民之所以見稱為酷虐者以此。古所謂刑者，必以兵刃虧人體至於不可復屬，此其始皆用諸戰陳，施諸異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蓋以施諸異族者，貤及本族也。黃帝，書稱其清問下民，亦侯之門人亦存耳，其所恃以自養者，恐亦無以異於三苗也。此吾國之奴隸社會也。江、河上游，古多沮澤，水利饒而水患亦深，共工、鯀、禹，仍世以治水為務，共工與鯀皆蒙惡名，而禹獨擅美譽，非其治水之術，果有以大異於前人也。自夏以後，吾族蓋稍西遷？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遷而水災澹焉，則以為神禹之功云爾。出沮澤之地，入蒼莽之區，不務力耕，惟求遠迹，則於所征服之民，但使輸稅賦而止，夏后氏之貢法是也。貢之名，乃取諸異部族者，與取諸本部族之稅賦大異，夏后氏之貢，實以稅而蒙貢名，蓋初施諸來服之異部族，後雖入居其部，征服者與所征服者，已合為一，而其法仍未變也。至此，則向恃奴隸之耕作以為養者，一變而衣食於農奴之租稅矣。此吾國之封建社會也。自夏至於西周，此局蓋未大變？故尚論者多以三代並稱焉。孔子稱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必有所據。禮即法，惟俗相類，故禮相類，惟社會之組織相類，故俗相類也。東周以降，種殖、製造之技蓋日精，通工易事之風亦益盛，則斯民之生計漸舒，戶口日增，墾拓日廣，道途日闢，風尚日同，則可以興大師，則可以造利兵，則可以遠征，則可以久駐[134]。所征服之國能供億也。吳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會也。生事之演進，無一非軍事、政事之先驅，而統一之業，與資本之昌駢進矣。然以吾國疆域之廣，水

[134]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總論〉，2。

陸程途之修阻，風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幾，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驁者，蓋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樞失馭，則紛然並起而圖割據矣，此州郡藩鎮之禍所由來也，瘠土之民，脫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奪之，勢也。吾國東南臨海，大軍不能飛越，西南則山嶺崎嶇，處其間者不能合大羣，亦無由成為強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資鍛鍊，又平夷有利驅馳，每為侵掠者所根據，而河、湟、青海之間，亦其次也。爭戰必資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敵，漢、唐盛時，所以能威棱遠憺者以此，然自來操政治之權者，多荒淫而無遠慮，睹異族之臣服，則苟利一時之休息，而不暇維萬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賦役，恣虐使也，如後漢之苦役降羌，晉世并州多以匈奴為佃客，且掠賣胡羯為奴婢是也。則使之入居塞內；而風塵有警，又驅其人以為兵；於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項之禍所由來也。孔子所謂大同，即古共產之世也，其和親康樂無論矣。封建之世，黷武之族，雖坐役殖產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誅求者，亦賦稅力役而已，於所征服之族社會固有之組織，未嘗加以破壞也。以力脅奪，所得究屬有限，而歷時稍久，且將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漸進於文明，故封建之世，社會之規制，尚未至於大壞，猶之人體，雖有寄生之蟲，猶未至於甚病，故孔子稱為小康也。至資本主義既昌，則昔時之分職，悉成為獲利之彰，盡墮壞於無形之中，社會遂變而無組織，而民之生其間者苦矣。東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劌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蓋由於此。然斯時之社會，其體段則既大矣，其情狀則既隱曲而難明矣，而生其間者，利害之相齟齬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初於豫期之外，而事變之來，又多不可捉摸，則安得不視社會為無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務抑壓一己，以求與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與東漢之間，實為古今一大界。魏、晉以後之釋、老，宋、明兩代之理學，實改造社會之義既湮，人類再求所以自處，而再敗績焉者也[135]。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實相類也。讀隋、唐、五代之史者，其義當於此求之。

---

[135]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總論〉，3。

中國之史，非徒中國一國之史也，東方諸國之盛衰興替，蓋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變動，亦皆息息相關，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處之境不同，而其開化遂有遲早之異，後起諸族，必資先進之族之牖啓，故先進之國之動息，恒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進之國，在東方為中國，在西方則在地中海四圍，此二文明者，與接為搆，遂成今日之世界。其與接為搆也，一由海而一由陸。泛海者自中國經印度洋以入波斯灣，遵陸者則由蒙古經西域以入東歐。泛海之道，賈客由之，雖物質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無與於國家民族之盛衰興替。遵陸之道，則東方之民族，自茲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茲而東略，往往引起軒然大波焉。東西民族之動息，亦各有其時，月氏、匈奴，皆自東徂西者也，鐵勒、突厥、回紇、沙陀、黠戛斯，則自西徂東者也。黠戛斯雖滅回紇，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東略之力，至斯而頓，而東方之遼、金、元、清繼起焉。遼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漸染中國之文明，金、元、清則中國之文明，先東北行而啓發句驪，更折西北行以啓發渤海，然後下啓金源，伏流再發為滿洲，餘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瀾亦可謂壯闊矣。五胡亂華之後，隋、唐旋即盛強，而沙陀入據之後，則中國一阨於契丹，再阨於女真，三阨於蒙古，四阨於滿洲，為北族所弱者幾千年，則以鐵勒、突厥等，皆自西來，至東方而其力已衰，而遼、金、元、清則故東方之族類也。東西民族動息之交替，實在唐世，讀隋、唐、五代史者，於此義亦不可不知[136]。

六、多主題的專著

陳輝娟〈二十世紀 20- 40 年代中國歷史學家對中國宗族的研究：以呂思勉、陶希聖的研究為例〉，自近代中國開始有系統研究宗族史切入，以呂思勉和陶希聖為主要討論對象。作者認為真正的宗族史研究起於近代，受到西

[136]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總論〉，4。

方社會學、人類學和總體史學的影響，學者開始關切基層社會，於 1920- 1940 年代開始出現較系統化的宗族史研究，除專門學術著作外，《食貨》半月刊亦刊載多篇相關論文。本文結合傳統的學案體，從序、小傳、語錄，提要鉤玄，以宗族史研究為主體，以學案體方式研究呂思勉與陶希聖為個案，透過大環境之變遷，分析宗族史研究的時代意涵[137]。

《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上)(下)》書摘
書名：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上)(下)
作者：呂思勉
出版地：上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 年 4 月

前言

本書收錄了呂思勉有關中國文化思想史的論著，共計 9 種:《醫籍知津》、《群經概要》、《經子解題》、《中國文化史六講》、《理學綱要》、《先秦學術概論》、《大同釋義》、《中國社會變遷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

《醫籍知津》寫於 1919 年夏，是年呂思勉由謝利恒(觀)先生介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協助謝先生編纂《中國醫學詞典》，撰寫《中國醫籍源流論》一篇，系統敘述中國古代醫學典籍及其源流派別[138]。《中國醫籍源流論》後未收入《中國醫學詞典》，由謝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許冊分送同行友人。《醫籍知津》手稿 1 冊，5 萬餘字，即《中國醫籍源流論》的底稿。1980 年代，

[137] 因計畫篇幅所限，此處不擬深入論析李波〈呂思勉與《白話中國史》〉、陳輝娟〈二十世紀20-40年代中國歷史學家對中國宗族的研究：以呂思勉、陶希聖的研究為例〉論文內容，將於正式報告中討論。

[138]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

《醫籍知津》經呂思勉女兒呂翼仁抄錄，並與楊寬先生一同校對、補正、分節並加標題。胡道靜先生審閱後，撰寫了《題記》。此次刊出，以抄本為底本，並校以原稿，胡先生的《題記》用作附錄，以供讀者參考。

《群經概要》係未刊稿，為呂思勉 1923 年 12 月在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專修科講稿，由楊煥文記錄，再由學校印成油印本講義。油印本原題名為《群經筆記》，後定名為《群經概要》，與 1926 年初版的《經子解題》相互發明。呂思勉以歷史發展的眼光研究群經，故《群經概要》一書，更像一部簡明的經學史、學術史，其中不乏獨具的見解。

《經子解題》1926 年 4 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收入「國學小叢書」初版，1929 年 10 月收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1933 年 3 月國難後第 1 版，1934 年 1 月國難後第 2 版。1980 年代後，《經子解題》先後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論學集林》(下文簡稱「教育版」)，1995 年 12 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國學叢書」(1996 年 3 月第 2 版下文簡稱「華師大版」)，1999 年 1 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學者講壇叢書」(下文簡稱「文藝版」)，2006 年 6 月中國書籍出版社「國學名家選粹」叢書(下文簡稱「書籍版」)。「教育版」訂正了初版的錯字和刊誤，但《莊子》一節內有個別刪改。「華師大版」、「文藝版」均按「教育版」重印，也都訂正了錯字、刊誤，但刪改之處未能恢復。「書籍版」按初版重印，無刪改，但初版中的一些錯字、刊誤仍沿而未改。此次刊出，除訂正了初版的錯字、刊誤外，刪改之處也予以恢復。

《中國文化史六講》寫於 1929 年至 1930 年間，是呂思勉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授課時的講稿。原計畫分 20 講，現僅存 6 講，江蘇省常州中學校史陳列室藏有油印講義[139]。1997 年 9 月，《中國文化史六講》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呂思勉遺文集》(下)，2007 年 1 月收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名師講義」叢書。此次刊出，按原油印稿出版，校正了個別錯誤。

《理學綱要》寫於 1925 年至 1926 年間，是呂思勉在上海滬江大學任教

[139]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上，3。

講授中國哲學史時編寫的講義，後經修改，於 1931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1934 年 4 月國難後第一版。1988 年 3 月上海書店影印出版，1990 年收入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第二編印版出版，1996 年 3 月收入東方出版社「民國學術經典文庫．思想史類叢」。此外，還有臺北市華世出版社 1977 年的重印本。《理學綱要》初版後，呂思勉自己即作過一遍訂正。其後，楊寬、呂翼仁又再校對。本次刊出，以初版為底本，同時吸取了作者本人、楊寬、呂翼仁的校訂成果。書中《訂戴》一篇，原刊於 1928 年《光華期刊》第 3 期(1928 年 5 月出版)，初版時附於總論內，現仍用為附錄。

《先秦學術概論》1933 年 10 月由上海世界書局初版，1985 年 6 月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中國學術叢書」(下文簡稱「大百科版」)，1992 年收入上海書店「民國叢書」影印出版，1996 年「大百科版」由更名後的東方出版中心重印(下文簡稱「東方版」)，2005 年 12 月收入雲南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出版(下文簡稱「雲南版」)。《先秦學術概論》出版後，呂思勉自己曾作過一遍校訂，「大百科版」、「東方版」均按呂思勉的校訂改正了部分錯字和刊誤，但未刊陳協恭寫的《序》，且《墨家》一章有少許刪節。「雲南版」增補了《序》，訂正了一些遺漏、錯字和刊誤，但刪節之處未能補全。此次刊出，除增補陳《序》、補全刪節及訂正刊誤、錯字外，還增加了一處呂思勉的眉批。

《大同釋義》原名《孔子大同釋義》，寫於 1930 年代初，初刊於 1935 年《文化建設(月刊)》第 1 卷第 10、11 期[140]。《大同釋義》係以文言文撰寫，1933 至 1934 年間，呂思勉為給光華大學學生作演講，特將《大同釋義》改寫為白話文，取名《中國社會變遷史》。1997 年 9 月《中國社會變遷史》改名為《大同釋義》，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呂思勉遺文集》(下)，但有刪改。此次刊出，《大同釋義》和《中國社會變遷史》均按原稿校訂勘誤，刪改的地方也按原稿補全。

---

[140]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上，4。

《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原是呂思勉 1935 年在上海光華大學的演講，由呂翼仁記錄，初刊於《光華大學半月刊》(第 4 卷第 5 期至第 5 卷第 4 期，1935.12—1936.12)，署名為「呂思勉講，呂翼仁記」。1980 年代，呂翼仁曾做過一些校對和整理工作。1997 年 9 月，收入《呂思勉遺文集》(下)，有刪節。2007 年 1 月收入天津古籍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增補了刪節。此次刊出，按《光華大學半月刊》的刊印稿重新整理，除了改正刊誤、恢復刪節外，個別文字則按呂翼仁的修訂改正。為了便於閱讀，《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由編者按每一講的內容添加了標題[141]。

到大同之路

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這句話說得最好。假使有一個成年的人，其道德心，竟和赤子一樣，我們自不得不推之為大人了。但是大人和赤子，仍有一個異點。赤子是未曾接受環境的影響，所以能保其大人之德的。但其年漸長，受社會的漸染日深，而其道德心，亦即隨之而淪喪。大人則不然。他受環境的影響，已經很深切了。對於惡社會，是很能夠瞭解的。隨波逐流，加入惡的力量，也是有的。因其天性之獨厚，觀察之獨深，不以恆人之所謂幸福者為幸福；深知福與善必相一致；於是卓然獨立，不為環境所轉移。既不為環境所轉移，則多少必能轉移環境，這才不是為環境所決定的大人；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改造環境，以回復其天德的赤子。必至此，才可謂之入於不退轉地。個人如此，社會亦然。被環境所決定的社會，是靠不住的。古代社會，環境好的，竟能實現出大同世界；其壞的，就野蠻殘酷得更無人理；而組織極好的社會，遭遇壞環境，亦即隨之為轉移，即由於此。必其經歷萬難，知識增高；知道從前所走的，都是歧路，而自動的有意識地回復過來。這種赤子之心，才能保其不再喪失。這是歷史上的大同時代，和

[141]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上，5。

今後的大同時代不同之點，正和赤子同大人的異點一樣。

覺得所處的社會不好，而想把他改造，不是始於現在的。幾千年以前，早有轟轟烈烈的運動了。但是為什麼終於無效呢[142]？

是由囿於小康，誤以為所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即是登峰造極之境，不敢作更進一步之想。不但自己不敢作此想，遇有持此等議論的，亦必力加排斥。宋儒疑《禮運》非孔子之言，即其一例。而不知所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即三代之治者，其實是階級之治。既有階級，兩階級的利害，總不能相容。無論自覺地，不自覺地，總處於此肥彼瘠的地位；總不免明爭暗鬥的行為。此豈言治究竟之義？無論後人所謂三代之治者，實多半雜以理想，不易達到；即實際上三代的情形，恐亦不易回復。因為即僅如此，所需「公」「仁」之心，也遠較今日社會中人所具有為多。此等有限量的「公」「仁」之心，在後世的社會裡，也是不易實現的。因為根於自私自利之心而來的制度，總是愈演進而愈形其深刻的。

後世談社會改革的人，其哲學上的見地太偏於唯心論了。孟子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矣[143]。」都明明承認多數人總是中材，而所謂豪傑之士，只是少數。少數豪傑之士，固然可以希望他同環境反抗，多數中材，則總須先改造其環境，然後能得到解放。好比壓在頹牆之下的人，苟非力士，必先把壓在他身上之物起去，他才會爬起來。此理在古代，本來人人明白的，所以說到治天下，總要從改革制度一方面著想。在惡制度之下，責人為善的很少。後人此等觀念，卻茫昧了。對於環境，總不想努力改良；只想在現狀之下，責人以為善。而不知道大多數人，總是被環境決定的，有怎樣的環境，就只有怎樣的社會。因果關係，絲毫不得差忒，哪有希望的餘地？

---

142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28。

143 《孟子．梁惠王上》

前項所述的弊病，是東漢以後才盛的。大約鑒於新室改革的失敗，所以大不敢談改革制度，而專在人心一方面著想。西漢時代的人，還不是如此，先秦更不必說了。然而從東周至西漢，不論是全局或一枝一節的改革，亦無不終於失敗，這是什麼理由呢[144]？我說：他們的失敗，亦有兩端：

狃於小康以降的局面，以為人生來有君子小人之分，小人總是不能自治，要待治於人的。於是一切法子，無不是自上而下。不知領導人民，開發人民，共同從事改革，而一味操刀代斲。人民能瞭解，而且覺得自己需要的事，就辦得好，否則就辦不好，此例在歷史上不勝枚舉。譬如常平倉，是官辦的事業。法雖良，意雖美，到後來便有名無實了。義倉的本意，是令人民自辦的，所以比較上辦得好。然其起原，仍由在上者之提倡；故人民實亦不能自動；管理之權，乃逐漸歸之於官；而其事亦遂有名無實。社倉的起原，可以說人民自發的，所以成績最好。然而放行之處，並非人民皆能自動，故其好壞，亦即視其能否自動以為衡。又如役法，是唐宋以來，厲民最甚之政。其實亦非唐以後才厲民，不過自唐以後，所傳的史料，才較詳備罷了。以制度言，自宋訖明，以事實言，亦可謂自宋訖今，議論紛紜，竟無良策。而人民能自辦義役的地方，則官事辦而人民亦不受其害。人民的自治，竟能補救政府治理之力之窮了。又如民兵：宋朝神宗所行的保甲，試讀《宋史．兵志》所載司馬光、王巖叟的奏疏，其有名無實，反滋擾纍的情形，真要令人氣結。然試一讀蘇軾《請存恤河北弓箭社》的奏章，則又令人氣足神旺。總而言之：人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力之偉大，實非操刀代斲的政治家所能想像。此等例不勝枚舉。

狃於古代自給自足的小社會。不知分工合力的範圍雖然擴大，人和人的聯結雖然因此而密切，但只要彼此利害，不立於敵對地位，而立於共同的地位，人總還是相親相愛，無詐無虞的。而誤以為風俗要回到古初之淳，則人對自然的關係，及人與人的關係，亦必須回復到古初一樣，則非將社會倒退

[144]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29。

數千年，退化其技術，而割斷其人與人間之聯繫不可。這如何可行？《鹽鐵論》的《散不足》篇，最能表現此等思想。漢人講重農抑商，不想出一種新分配的方法來，以代商人的交換，而只想抑制商人。果如其所希望，商人盡反於南畝，豈非分工合力的範圍，驟行縮小？而社會生活程度，將倒退數百千年？

新室以前的革命，東漢以後的改良，無不失敗，其重要的原因，大概不外乎此了。然則我們今日，苟反其道而行之，能否使社會逐漸改善，而終至於上理呢[145]？我讀《桃花源記》在 9 歲時候。當時父師詔我，說這時寓言；我亦誠以為寓言而已矣。到 14 時，讀《經世文編》，在其第 23 卷中，看見這一篇文字。這一篇文字，無可指為寓言之理。當時頗因此而疑《桃花源記》之亦非寓言。但當時未有社會思想，《招墾里記》這一篇文字，有何價值？《桃花源記》是寓言，還是事實？有何關係？自然都不成問題。其實這一類事實，散見在昔人記載中，其數甚夥，正不獨桃花源與招墾里為獨有千古。即以我的淺陋，披覽之餘，覺得此等記載，遇見的亦不止一兩次。惜乎當時看得不成問題，沒有鈔摘下來。到如今，要想蒐羅這一類事實，竟是大海茫茫，無從尋檢[146]。除掉這最初所見的一則，腦筋中的印象，畢竟深些，還能翻檢出來，其餘竟無從蒐索了。無已，再舉一則民國 22 年 11 月某日上海《申報》所載是月 15 日山東費縣的通信，以作佐證，這與桃花源、招墾里，又何以異？我所以要抄此兩則，不過見得人全是環境所造成；有怎樣的環境，就成怎樣的人；無所謂世風不古，無所謂古今人不相及。假使我們現在，能把環境回復到和古代一樣，怕慾求今人之不為古人而不可得呢？

但是此等為環境所決定的社會，並不足取。一者他是為環境所決定的，環境變壞，他也要跟著壞。二要造成此等環境，在今日萬萬不可能。即使能之，而將人類對自然的關係，倒退了數百千年，這又何苦？而況乎其萬萬不可能

---

145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0。

146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1。

呢[147]？我們要造成：對自然的關係，比現在還要良好，而且繼續進步，永無停滯之期。

而人與人之間之關係，則和古代的大同社會一樣。

而其此等環境，又係由自己的意志所造成，並非靠運氣好，偶然遇到。我們就要造成這樣的社會。

我以為中國古代的辦法和古人的見解，有仍足供今人參考者三端，敬陳其說於後：

中國的社會革命，當注重於農人。持馬克思主義的人，以為社會革命，必以工人居前線，而農民則非經長期的教育不能望其政變。因為農人無如工人的團結；而且不習於現代生產，倒是固執著私產制度。亦且見聞狹隘，生活簡單；篤於守舊，難與維新，不易牖啓之故。這話固有相當的理由；觀於蘇俄的改革，則並有事實為之證明。然而以農立國的國家如我國，難道就不想革命嗎？難道坐待我國變成工業國，造成勞資對立的階級，然後再圖革命麼？這也未免失之太拘了。我以為以農立國如我國，領導農民革命，正為當務之急。領導農民革命，當用何種手段呢？簡單的均田政策，是斷乎行不通的。因為他並不能改變農民擁護私產的心理[148]。擁護私產的心理不變，即則使田經一度之均，亦必不久而仍復其舊。在歷史上，如晉代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初的租庸調法，當其初行之時，田畝總必有比較的平均，然而不久即復於其舊，即以此故。溝洫疆界，豈能終日陳兵以守之？然則如之何而可？我們知道，非意識決定生活，實生活決定意識。而人的生活，又是隨生產方法的改變而改變的，然則在今日，努力改良農民的生產方法，就是改變農民心理最有效的手段。怎樣改變農民的生產方法呢？則耕作使用機械，是其第一要件。唯耕作使用機械，然後今日寸寸割裂的土地，乃覺其不利。然後擁護私有財產的人，乃自覺其此疆彼界之不利。事實最雄辯，到這時候，

147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2。
148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3。

農民自然逐漸覺悟，而願將土地整理；而其耕作，自亦漸趨於共同。固然，土地的改正，耕作的共同，未必就是私產制度之廢除。然而積之久，制度日進於公，自私之見，終必隨之而漸化。到此時，再逐漸施以化私為公的教育，道以化私為公辦法，那就真如下令於流水之原了。這種辦法，固非旦夕間可以奏效，然而每一事件的進行，總是愈到後來，而其速率愈大，也不得十分遲緩的。正不必過於急激的手段。這一種說法，偏於激烈的人，或者不贊成；又或者嫌其手段的遲緩，然而我的愚見，頗認為是農業社會真正的出路。耕作使用機械，足以改變農民的心理，俄國的近事，最足供我們的參考。俄國革命以後，將大地主的土田變為耕者所自有。農民自私之心很深，不願分其收穫貢諸國家。俄政府至須遣兵征糧，農民則起而反抗，紛擾甚而國家仍苦伐糧。1921 年，乃征農稅而所餘聽其私有。於是富農漸起，社會主義幾於破壞。1928 年，有馬克維次(Maikevich)者，管理國營農場，以所餘機犁，假諸附近農民，而以共同耕作為條件，農民從之。是為集合農場所自始。俄政府乃推行其法於各處。到現在，有耕地、耕具悉數作為公有；並依食住亦進而共管的。(詳見張君勱所著《史泰林治下之蘇俄》)以政令所不能強，口舌所不能爭之事，而生產方法的改變，足以轉移之，馬克思的學說，在此等處，不能說其無效了。而我國古代的所謂「教」，不尚空言，而專注重於改良人民的生活，得此亦足證其自有至理。

經濟上分工協力的範圍，後世較諸古代，已不知其擴大若干倍了。至於今日，則幾將合全世界而為一[149]。此等業已聯結之局，固然不能像老子等的意見，還想斷其聯繫，而還之於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然而要把社會真正整頓好，則仍有分為若干區域，各別以整理的必要。現在的趨勢，是各地方的聯結，日見密切；然而此等聯結，實不見佳。我們要聯結，而不要這樣子的聯結。我們要另換一種新聯結。新聯結必須要有良好的基礎，就是被聯結的分子，個個都要健全。要求其健全，則其組織不能十分龐大。我們目前的情

[149]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4。

勢是：

所聯結之分子，本不見佳。

而又因聯結之故，更增其惡化。

我們的對治之策是：

祛除被聯結的分子本身的弱點。

改良其聯結之法，使不至因聯結而生出惡果。

二者都有將今日之所謂都會者，斲而小之之必要。人類居住區域的大小，亦即每一區域中聚集的人的多少，本因其對自然的關係，而有一個適當的限度。而在今日，人類聚居的情形，大概與天然的形勢不合。簡單則易治，複雜則難理。大則倫敦、巴黎、紐約、上海，固然無可措手；就是京、平、蘇、杭，也已經無能為力了。依我看，最大的都邑，最好不超過萬家。這種說法，經濟學家，必將聞之而大笑。經濟學的原則是要以最少的勞費，得最大的效益。要以最少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則生產的規模，不能不大。如此，人類的居處，勢必隨之而集中。如何能把大都會斲而小之呢？難道想回復到舊式的生產麼？殊不知天下事總要兩方面顧到，不可趨於一極端。人的聚散，自有其一定的法則。過疏固然不好，過密亦非所宜。什麼是人的聚散的法則呢？從人對人的關係言之，則人類相親相愛之情，樂於群萃州處，是把散居各地方的人，吸集到一處去的，如物理學之有向心力。而人對人，雖其本性上可以說是愛無差等，然其行之，則不能不限於其所能交接之人；而人所能交接的人，事實上總有制限。混在萬人如海的社會中，不覺得之相人偶之樂，而徒苦其煩囂。這又是一種離心力，限制人不能為無限的集合的。以人對物的關係而言之，人聚得多，則生產的規模大，可以較少的勞費，得較大的效果，這是把人吸集到一處去的原因。而同時，人的密集太甚，又覺得種種不適，又使人感覺到：我們何苦為省這生產上的一點氣力，而忍受別方面許多苦痛呢[150]？這又是限制人，使不能為無限的集合的條件。我們對這

[150]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5。

兩方面的評價，酌度而得其中，便是人的聚居自然的限度。現在的生產，所生產之物都是商品。商品須求其價廉，求價廉，先須減輕成本。所以不得不忍受其餘的苦痛，以就擴大的生產機關。到所生產的非為商品，情形就一變了。舊式的紡織機，一人一具，是為人而造械器的。新式的紡織機，聚集至數千萬人，是以人就械器。兩者都不是好法子，我們要酌乎其中。甲區域適宜於住 100 個人，就為他造 1 副 100 個人使用的械器。乙區域適宜於住 30 個人，又替造 1 副械器，較甲區域所用，小到只有其 10 分之 3。甲乙兩區域住民的情形，如有變更，械器也就因之而改造了。圖生產費的節省，機械總是利用於大的，不專在這一標準之下，評論機械，則機械之宜大宜小，就成疑問。即使生產費總是大規模來得節省，我們要利用機械，而不為機械所支配，亦當如此；況乎現代利用最廣的蒸汽力，未必不可代以他力。如電力。以他力代蒸汽，生產事業規模的大小，和其生產費的大小，其比例，就未必和蒸汽力相同了。至於人與人間的關係，要在較小的區域中，方易於整頓，則其事更顯而易見。因為人多了，則人和人互相親愛之力不強，而其制裁之力亦薄；事情又複雜而難明；種種惡德惡俗，就都要由此而生了。就都會之起源而言之，無論其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必須保留的理由，都是隨著社會病態的發展而後有，而後盛的。如因守禦故而築城堡，因成都市；又如亂世，因都市防衛之力較固，人民從而集中，都市因之，愈形發達；這都是政治上的理由。商工業上的大都會，是因為便於牟利起見而發達的；而大都會中，資力較厚，享樂之事較多，亦有人貪享樂而走集於此的；這都是經濟上的理由。然而無一非社會的病態。所以今日，慾進世界於太平，所謂都會者，實有斲而小之之必要。而各地方的人民，各謀解決其本地方的問題，實在是人類把自己的事情，措置得妥妥帖帖的惟一的途徑。我們言治的最終目的，是要全世界風同道一；豐嗇苦樂，均無不同。天然的不平等，我們以人力彌補之。而在著手之初，則不能不有賴於各地方的各有整頓。歐文所提倡的新村，所懷抱的，就是此等理想。雖然他的實驗失敗了，不能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而且這怕是社會改革，一定要走的路。孫中山提倡地方自治，亦

是有鑒於此[151]。經濟為社會的基礎，所以中山的意思，想要以一個地方，成為一個經濟上的單位，而力謀其基礎的充實。如其所著《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有云：「執行機關之下，當設立多少專局。……而其首要，在糧食管理局。量地方之人口，儲備至少足供 1 年之糧食。地方之農產，必先足供地方之食，乃准銷售於外地。故糧食一類，當由地方公局賣買。……衣住行 3 種需要的生產機關，悉當歸地方支配，逐漸設局管理。」這就很足以表現此等思想。現在各地方的自治，有許多地方，似乎是反而走向大都會之路上去的。這因現在的所謂自治，其根本並不是人的自治；不是想實現人生世上合理的自處之道，而只是想適合現在的某種主義。到人真能實現其合理的生活時，其目的就和現代大不相同；而我所謂人的聚散的法則，就大有考慮的價值了。然則古代度地居民之制，在言社會改革之家，亦大有參考的價值。

當從事改革之時，消費的限制，此為禮之一端，而亦可說是禮之最重要之一端。大有考慮的價值，即使到太平之世，物質豐富，達於極點，無論怎樣消費，總不虞其不足，其實消費毫無制限，生產力無論如何強大，亦總要陷於不足的。所以論經濟，決不能置消費問題於不論。而人受生理的限制，要顧及衛生，亦不宜為逾分的消費。因為逾分的消費，不但消耗物質，也是消耗人的體力的。而人的慾望，實亦根於生理而發。所以真正健全的人，決不會有逾分的慾望。其人而有奢侈之念，則身心必不健全，必已害了病了。對於此等人，當請醫生為之治療，豈可以盡量供給其消費，為其幸福？這是將來的話，而當改革之時，則禁奢尤為必要的手段。社會生產的技術，在大體上，總是逐漸進步的。然而後人並不比前人富，或且更窮。這全由於：

一部分人，得以奢侈，因而造了許多無用之物。

一部分人，消耗太多，他部分人因之感覺不足。

否則以中世的生產，供給古代的消費；以現代的生產，供給中世的消費；早已菽粟如水火了。財富的價值，終在消費。禁止之使不得消費，其價值即

[151]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6。

行消失[152]。所以我們用不著剝奪人家的私產，只要辦到無論何人，消費總只許在一定限度之內，那私產的制度，就不廢而自廢了。這固然近於戲語。然而消費的限制嚴一分，則私產的效用少一分；而人之貪求之心，亦澹一分；則無可疑之理。有了錢，就可以任意消費，這本是資本主義逐漸興盛，然後如此的。其在前代，本都略有制限。即至後世，逐漸成為具文，然而具文總還在。禮、律中皆有之。歷代的制限，皆隨貴賤而不同，論者一定要說：這是封建時代，征服之族，暴戾恣睢，壓迫被征服之族之舉。其實與其如此之說，毋寧說是被征服之族，本有良好規則，而征服之族，也不得不俯就幾分，若盡率征服者之意而行之，那就要無所不至了。我們現在，當師古代禁奢之法，參以翼奉遷都之意，逐漸造出許多新都市、新村落來。在此新區域之中，不論何人，享用都是一律。享用一律平等，似乎是很難的。因為現存之物，決不能悉數毀棄重造，分配使用起來，就不能平等了。然而亦有調劑之法。如房屋雖有好壞，可以古人分田，「三年一換主易居」之法行之，就不生分配不平的問題了。其餘以此類推。而此享用之限度，則視其地之生活程度以為衡。今年的生活程度，只是吃菜，則一律不許食肉。必待生活程度進了一級，然後享用的程度，乃得隨之而進一級。又非一地方的生產力，逐漸提高，產品即專供該地方之享用；必須提出一部分，以協濟生活程度較低的地方。此等新區域逐漸推廣，則奢侈之風氣逐漸消除。各地方之人，消費之程度，都與其生產程度相應，而天下遂無患貧之事。歷代禁奢之所以失敗，皆由其有等級性，按人身分之高低，以定享用的豐嗇。身分低的人，自然不服，而且這也是一種誘惑。如今大家一律，則自無此弊。其行之之法，當從禁售起。某地方為布衣之年，則一律不許開設綢肆；某地方為吃菜之年，則舊有的屠肆，一律關閉。新造的都市，商業都歸公營。其就舊都市改良的，商業也要逐漸收歸公營。但仍承認私人的資本，發給股票，聽其取息。這是初步的辦法。將來再徐圖取消。商業官營，是改良社會一個最好的方法。私人雖可生

[152]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7。

產，而不能互相交易，則祇能照其成本，收回相當的價格，而不能利用需要供給等關係，以牟大利。數千年來，活躍於社會的商業資本，生產消費者兩方面，都受其剝削的，就可以打倒了[153]。如此，作奸犯科之事，自然一定是有的；而且一定是很盛的。然天下事不能一蹴而就幾於上理，總要行之以漸。我們認為義所當然之事，雖明知其難行，總要設法逐漸推行的。譬如現在的毒品，誰敢保其一禁即絕？然而豈能因此而不禁呢？況且私售究與公開有別。現在一切奢侈品，倘亦和毒品一樣，不能公然製造販賣，而只能如毒品的私售，我們已經欣然於公理之大彰；而覺得社會的進步，同飛行絕跡一般了。

以上三端，都是我以為歷史上的陳跡，仍足供今日談社會革命的人的參考的。自然，社會改革之法，不盡於此三端；此三端是否有參考的價值，自隨各人的意見而不同。我只是考古之餘，陳述個人的感想罷了。

講理學的人常說，我們要增進道德，和要增進知識不同。增進知識，要增益其所本無。增進道德，則只須將有生以來，所染著的垢污，洗滌淨盡就好了。我們試仔細推究，現在所有的罪惡，哪一件是與生俱來的呢？惟社會亦然。惡劣的風俗，哪一件不是惡劣的制度所造成；惡劣的制度，又哪一件不是人類在進化的途中，環境未臻於美善所致？哪一件有必然之理？佛說凡事皆因緣際會所成，並無自性。惟無自性，故能證明其為人類業力所造成；亦惟其無自性，故必可以人類的努力消滅之；我們當有此信念。

我們希望將來的社會：人與人之利害，全然一致。人對物，亦因抗爭之力強了，只蒙其利而不受其害。因此，人與人，固然惟是互相親愛，即其對物，亦無復憎惡、畏怖之念。至於各種達不到目的的希望，則本是不健全的心理所致；而其所以然，又都是社會缺陷的反映。這時候，也自然消滅了。人就只有快樂，更無苦痛。而此等境界，又係人類覺悟之後，以自力所造成，並非靠偶然的幸運而遇到，所以能保其永不退轉。夫是之謂大同。

---

[153]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8。

我們感謝孔子：在幾千年前，就指示我們以社會組織最高的模範。我們感謝《禮記》的記者，將這一段話記載、流傳下來，給我們以最深切的影響[154]。懸以此為目標，而勇猛審慎以赴之，不但能拯我國民，拯我民族於深淵，並可以出全世界的人類於沉淪的苦海。

我們才知道中國的文化：視人對物之關係為次要，而視人對人的關係為首要；不偏重於個人的修養，用什麼天國、淨土之說，來麻醉欺騙人，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解決個人問題之前提及手段；確有甚大的價值。

當這目的未達、徬徨中途之時，我們自該有甚大的努力。我請誦兩大賢之言，以為本書的終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呂思勉論學叢稿》書摘

書名：呂思勉論學叢稿

作者：呂思勉

出版地：上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6 年 12 月

前言

《呂思勉論學叢稿》收輯各類文章共 102 篇，大體分為「史學」、「哲學」、「社會經濟文化」、「文學文獻文字」和「書信序跋自述」等 5 組，內部又按寫作和發表年代的先後加以編排。

[154] 呂思勉，《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下，739。

「史學」和「哲學」二組收錄的是呂思勉在 1910 至 1950 年間的部分學術文章，其中《古史紀年考》、《蒙古種族考》、《秦漢移民論》、《漢人訾產雜論》、《道家起原雜考》等，都是呂思勉早年的重要論文，曾刊於《大中華》、《齊魯學報》等學刊及《古史辨》等 7 冊中[155]。《辯梁任公〈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發表於 1923 年的《東方雜志》，反駁當時梁啟超主張陰陽五行起於戰國時代燕齊方士而由鄒衍首先傳播的說法，認為梁氏此說頗傷武斷，而其誤在於信經而疑傳。《中國文化東南早於西北說》、《古代人性論十家五派》、《西漢哲學思想》、《魏晉玄談》等篇，是 20 世紀 30 年代前後呂思勉在上海光華大學、滬江大學的教學講稿。《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係》和《古代印度與佛教》最初都發表在 20 年代初期的《瀋陽高師周刊》上，也是因教學的需要而撰寫。《古代印度與佛教》是呂思勉少數幾篇專門論述外國史的文章，文中對人種分布、民族遷移、東西方交通往還、印度宗教的興衰和傳播等敘述，頗為簡明而扼要，對了解古代中印之間和東西方關係，很有參考價值。

「社會經濟文化」一組收輯的時論性文章共 30 篇，內容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呂思勉是一位純正的學者，不參與實際的政治活動，但對社會變遷、民眾生計等現實問題極為關心，其立言行事多為社會民眾著想，常以一個歷史學者的立場參與一些社會問題的討論，發表自己的看法，本輯收錄的《論文官考試之宜嚴》、《國體問題學理上之研究》、《田賦征收實物問題》、《因整理土地推論到住的問題》、《中國文化診斷一說》、《續說》、《學制芻議》、《新生活鑑古》、《如何根治貪汙》等篇，都是呂思勉為謀求社會改革所寫而刊於當年各種報刊雜誌上的文章。《義州遊記》是呂思勉所寫的惟一一篇遊記，1920 年先生利用國慶假期，偕同事遊朝鮮義州。是篇乃歷史學者之遊記，頗注意歷史沿革、中朝邊境的物產貿易以及風物人情，《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是一篇論述近世學術變遷、

[155]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

學術與政治的關係的長文章，文章雖是對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的評說，從中也可見呂思勉的治學路徑和為人處事的宗旨。

「文學文獻文字」一組收輯文學、文史教學、文字學等長短文章 24 篇[156]。其中《小說叢話》、《〈詩經〉與民歌》、《新舊文學之研究》、《論基本國文》、《文學批判之標準》等篇，是呂思勉存稿中為數不多的有關詩文、小說等文學領域的理論批評文章。《整理舊籍之方法》、《乙部舉要》、《怎樣讀中國歷史》、《中學歷史教學實際問題》、《從我學習歷史的經過說到現在的學習方法》、《史學上的兩條大路》等，都是呂思勉為指導青年學生學習中國文史所寫的文章，有些原是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光華大學裡的演講稿。認為讀中國史書，當注意治亂興衰和典章經制兩大方面；讀正史先當用功四史；讀先秦古書，不可不讀前人的注疏和校勘；又說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學者當就自己的閱歷所及，隨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正不必競競於故紙堆中討生活了等，這些很具體的讀書方法，都是基於呂思勉自己的治學經驗，實在是治學的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呂思勉對文字學素有研究，早年的代表作有《章句論》、《中國文字變遷多》、《字例略說》、《說文解字文考》(後合為《文字學四種》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本輯所收的 3 篇，均寫於 20 世紀 30 至 50 年代，其中《論文字之改革》，是呂思勉去世前數日才脫稿的最後一篇文章，原是《字例略說》的增補稿。文章對當年的文字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文字改革不能速，亦不能過恃政令之力，更不可紊亂其自然之規律，而造出苦難。

「書信序跋自述」一組共收輯文章 21 篇。其中《至廖仲凱朱執信論學書》寫成於 1920 年 5 月(刊於同年《建設雜誌》第 2 卷第 6 期)，這是呂思勉第一次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是他第一次以歷史學家的立場，參與當時學界的關於井田制的學術討論。《三上光華大學行政會書》，分別寫於 1927、1928 和 1945 年。1927、1928 年，光華大學的初建正值日本侵華戰爭的前夕，呂

156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3。

思勉認為中國同日本的戰爭，只是時間的遲早問題，而中國也只有打勝這一戰，才能立足於世界。因此學校的建設或社會的各項舉措，都應從這種實際情況出發。為此他兩次上書光華大學行政會，對學校的建設和改革，提出自己的見解[157]。抗戰爆發之後，光華校舍悉成煨燼，學校不得不停辦。1945 年抗戰勝利，光華大學復校，校領導合議復校之策，呂思勉第 3 次上書光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具體地申述了他的復校計畫。第 1、2 封上校務行政會書，曾刊於《光華大學周刊》和光華學生所辦刊物《小雅》上，為錢穆所激賞，譽為西京賈晁之論。本輯所收的《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全文約 1 萬 5 千字，是呂思勉自述的傳記文字，雖是思想改造的總結，實是研究呂思勉的思想演變、學術觀點和生平經歷的重要資料。

歷史上之民兵與募兵

予既撰《非攻寢兵平議》；難者或曰：如子言，則兵終不可得而弭；兵終不可得而弭，則中國終不能不恃兵以自存。而欲恃兵以自存，則中國其危矣。何也，人才非一時所能造就也；國民怯戰之心，非一時所可變也；糧餉之儲，交通之具，非一時所能備也；現今戰事，最重器械；器械之精，端資學術；尤非一時所能深造也。此等即皆勿論，但養兵數十萬，已非今日財力所能堪矣；況於一船一砲之費，動累巨萬乎？夫不富強則不能戰而，非戰勝又不能富強，則中國其將淪胥及溺矣乎？應之曰：是不然。吾之所以非非攻寢兵者？謂以理言之，兵終不可盡弭。今之作弭兵之論者，於理已不甚圜，而尤不合目前之情勢，故辭而辟之，以見持論之不可偏於感情，走入極端耳。非謂中國當恃兵以自存也。中國素不主侵畧；海通以來，兵事之窳，且不敵歐洲一小國；其所以不亡者，亦自有故，而非必恃兵。然以立國百年之計言之，則兵終不可盡去。吾謂今後欲有兵之利而無其害，則莫如行民兵之制。行民兵之制，則國無養兵之費，可專力講求學術，發展交通，改良製造。此等事皆戰陳之本，而亦可以生利，非如養兵之純為消耗也。此固不慮財力之

[157]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4。

不能勝矣。近今持民兵之論者甚多。其詳細規畫，自非兵學專家不能道。予少好讀史，近嘗反覆史事而深思其故，乃知民兵有利無害；民不能執兵，而別有所謂兵者，則害多利少[158]。徵諸往史，固已昭然，而惜乎知此義者太少，乃有昔時之張皇練兵，至鑄成今日之大錯也。爰敢論其大畧，以告世之留心國是者焉。

自來讀史之人，有一謬見，即謂三代以前，皆兵民不分，至後世乃漸壞是也。吾則謂兵民合一之制，實始成於戰國之時，至後漢乃大壞。而兵民合一之時，即我國最強盛之時也。何以言之？案吾國古書言治制者，莫詳於儒家。儒家言有今古文之異；而政治制度，則其異同焦點之所在也。古文家之言兵：「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文家則以「師為一軍」。「王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雖其眾寡不同，然相去尚不甚遠。至於出軍之法，則今古文家言，皆有齟齬不可通者。古書言出兵之制，以《司馬法》及《春秋繁露》為最備。《繁露》今文家言；《司馬法》、《漢書 • 刑法志》採之，蓋古文家言也。今案其法：《司馬法》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四千乘，戎馬四千匹；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如此法，諸侯之國，有甲士三千，步卒七萬二千，凡七萬五千人，恰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之數。天子之國，有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而六軍不過七萬五千人。《司馬法》又有一說：以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

[158]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9。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照此法計算，天子之國，亦有車萬乘，士十萬，徒三十萬。《繁露》之法：以百畝三口為率，方里而二十四口。亦三分而除其一。故方百里之地，得十六萬口[159]。凡出三軍七千五百人，加一軍以奉公家，適得萬人，則十六人出一人，而天子地方千里，當得千六百萬口，凡出九軍，更加三軍以奉王家，凡三萬人，則五百三十三人乃出一人。兵役之重輕。相去未免太遠。若謂諸書所言兵額皆誤，人民股役輕重實同。則如《司馬法》之說，天子之國，當得三十七萬五千人；如《繁露》之說，當得百萬；春秋以前，又未見其事也。予謂言古代兵制者，皆為兵民合一之說所誤。善夫，江慎修之言曰：「說者謂古者寓兵於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為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為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為農者，處之野鄙，別為五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為兵。他國兵制，亦大畧可考。如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捨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以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曾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隨武子云：楚國刑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進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取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

[159]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0。

後捨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為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為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接近國都[160]。故楊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為兵也。」予案《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而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則伍兩卒旅師軍之眾，即出於比閭族黨州鄉之人。至其職又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則但云「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收斂之事」，初不以之為兵。則《周官》與《司馬法》，邱甸之制雖同，而所以用之者絕異。杜預注《春秋》作邱甲，以兩者并為一談，非也。蓋古代所謂國家者，其重心在國。與今國字異義。國者，擇中央山險之地，建立一城，凡戰勝之族，皆聚居焉；而國以外則為農人所居之地[161]。《周官》王城之外為鄉，鄉之外為遂，遂之外為甸。鄉之比閭，遂之鄰里。皆以五起數，合於軍隊什伍之制。邱甸則以九起數，與井田之制相附麗。農不為兵，即此可見。故天子之封地，雖百倍於諸侯，而其出兵亦不過數倍而止也。然則《司馬法》等書所言，皆鑿空之談乎？是又不然。蓋充兵與出賦有別。鄉之人，充兵而不出賦，甸之法，則出賦而不充兵。漢世民年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乃免，則古人充兵之遺。出口錢以補車騎馬，則古代出賦之制。二者本判然相離。其舉全國之民，既責之以充兵，復責之以出賦者，蓋起於戰國之世。故蘇秦說六國之辭，於燕、齊、韓、趙，皆云帶甲數十萬，於楚則云百萬。於魏，則云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是時戰事，坑降斬級，動以萬計；蘇秦之說，斷非虛誣。蓋前此鄉以外之民，雖非必不能執兵，然特以之守衛本土而止，畧如後

---

160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1。

161 此由古代之民，有征服及被征服之階級而然。其事甚長，當別論。予昔《辨胡適之論井田之誤》，嘗畧引其端。原文見《建設雜志》第二卷第六期。

世之鄉兵，至此乃皆令其出征，故其數大相懸殊也。鞌之戰，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出戰之兵雖敗，境內守禦之眾仍在。蘇秦說齊之辭曰：魏韓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張儀說齊之辭曰：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皆可見其傾國出鬥也。《周官》、《司馬法》，雖同為戰國時書，然《周官》所述多古制，故鄉以外之民，尚不充兵[162]。《司馬法》則專就六國制度立說，以向者鄉人所服之兵役，均攤之於全國人。《繁露》蓋孔子改定之制？孔子亦主全國皆充兵，不主限於鄉以內，故其計算之法，亦與《司馬法》同。按之古制，遂覺其齟齬而不可通也，然則兵民合一之制，實至戰國時始大成，固昭然名矣。

此等兵民合一之風，至後世猶有存者。漢制：郡國有材官車騎樓船。尉佐郡守，以立秋後講肄都試。民年二十三為正卒，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禦騎馳戰陣，至五十六乃免。當時京師南北軍，皆由人民調發。戍邊之責，亦人人有之。景帝以前，兵多調自郡國。武帝以後，乃多用謫發。據晁錯上兵事書所言，謫發之制，蓋始於秦，而漢人因之。綜《漢書》紀傳所載，所發者或為罪人，或為亡命，或為郡國惡少年，或為賈人、贅婿，或則身及父母太父母嘗有市籍者。此等在後世，皆不能執兵之人。而當時欲發即發，初不待更加教練，則其人能執兵可知。秦皇、漢武，世多并稱。其實始皇用兵，頗有為中國開疆土絕外患之意。其用人亦能持法，所任皆宿將。至漢武則徒動於侈心，欲貴其椒房之親耳，衛青和柔自媚，天下無稱；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所任如此，猶能累奏克捷，則以其兵固強，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也。中國兵威之盛，無過漢、唐。然漢代用兵，多以實力取勝。唐代則多乘人之弊。試以漢武深入擊匈奴，懸師征大宛，與太宗擒頡利、平西域比較可知。故漢武之時，雖舉國疲敝，而宣、元以後，遂安坐而致單于之朝。唐初雖形勢甚張，然高宗以後，突厥再張於北，吐蕃構釁於西，契丹小醜，亦且跳梁東北，中國竟無如之何矣。君子讀杜陵《兵車行》，更觀《漢

[162]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2。

志》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之俗，而知中國內完統一之業，外奏開拓之功，必始於戰國而成於秦、漢，為有由也。故曰：兵民合一之時，即中國最強盛之時也。

兵民合一之制之壞，實自後漢始。光武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七年，遂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163]。其後邊郡及衝要之處，雖或復置尉官，然全國人民皆習兵事之風，則自此大壞矣。晉武平吳，亦襲光武之政。兵民合一之制，亦盪焉無存。自此以後，藩鎮跋扈於南，異族恣睢於北，皆熟視而無如何。則以舉國之民皆弱，不能制異族之跳梁，不得不別有所謂兵者以防之；而所謂兵者，則握於強藩之手故也。故藩鎮之跋扈，異族之恣睢，皆民兵之亡為之也。斯時也，胡、羯、鮮卑、氐、羌，紛紛割據北方，皆用其本族或他族之人為兵，不用漢人。魏太武《遣臧質書》：「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可見五胡除本種人外，兼用他族之人為兵。高歡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致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可見此時以漢人任耕，鮮卑人任戰。漢人乃益俯首帖耳受制於他族之下。其時亦有偶發漢人為兵者，然每出輒敗北。如石虎伐燕，司、冀、青、徐、幽、并、雍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符堅伐晉，民每十丁遣一兵是也。宋文帝之攻魏，亦以江南民丁，輕進易退致敗。使在秦、漢，則此等皆強兵矣。觀其每出輒敗，即可知其受制他族之由，君子讀兩晉南北朝史，未嘗不嘆息於銅馬帝，以一時厭亂之情，遽壞秦、漢以來相傳之兵制也。雖然，兵之為物，不可偏廢，而亦不可過恃者也。當時之中國，以人不知兵，見侮於異族；而當時之異族，亦以恃其虓闞，狂噬無已，終至不戢自焚。蓋自東西魏分爭以來，五胡皆死亡畧盡，乃不得不用漢人為兵[164]。夫充兵之人，既非當時異族之人所

[163]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3。
[164]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4。

能給；而養兵之費，又非當時凋敝之局所克任；則不得不藉漢人為兵，而令其耕以自養；而府兵之制出焉。府兵之制，肇自後周，而沿於隋唐，論者又多美為兵農合一。然所貴乎民兵者，乃民皆能為兵，且民之外，別無所謂兵之謂；非兵亦能為農之謂。當時之府兵，固別有其籍。且後周府兵，總數不滿五萬；唐十道設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一；則民之不能為兵者實甚多；去戰國、秦、漢之制，固已遠矣。夫民既不能為兵，而強籍其若干人以為兵，則雖令其耕以自養，其實仍與募兵無異。故凡募兵之弊，唐室亦旋即蹈之。高宗而後，府兵之制，日以廢壞。玄宗時，至不能給宿衛。此即募兵名存實亡之弊也。府兵既名存實亡，則四裔之侵擾，不得不重邊兵以制之，而安史之亂起，中葉以後藩鎮割據之局成矣。宋有天下，鑒於唐室之弊，集兵權於中央。禁兵百萬，悉隸三衙，傾天下之財以養之。此特易其統率號令之權，其屯聚不散，與唐等耳。其弊也，擁兵雖多，而不可一戰。財力既盡，國亦隨之故。無兵則有西晉之禍，屯兵太多，則有晚唐之亂，北宋之弊。民兵既亡，兵制之無一而可如此。

中國以兵民分離而弱，而斯時之異族，則正以兵民合一而強。案遼之兵，以部族為主幹。史稱「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糗糧芻茭，道在是矣。」又述其部族軍之制，謂「勝兵甲者，即著軍籍。番居內地者，歲時田牧平莽間；邊防之戶，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潼，以為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能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部族實為之爪牙」焉。金初用兵，亦出部族。史稱「金之初年，諸部之兵，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道孛堇征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給焉。」又云：「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沈雄。兄弟子侄，才皆良將；部族餘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

征發調遣[165]。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強，以寡制眾，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之後，盡遷猛安謀克戶於中原，既失其強武之風，而又不能如漢人之勤事生產。博弈飲酒，悉成遊民。南遷以後，遂至一敗塗地矣。元初之兵，大別為二：一曰蒙古軍，其本部族人；一曰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人也。其制：民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隸兵籍。孩幼稍長，又籍之為漸丁軍，亦通國皆兵之制也。迨入中原後，兵制漸變，而其強弱亦迥殊矣，夫金、元入主中國後，未嘗不令其民為兵也，抑且欲長令其民為兵，以制漢人也；然其強弱遂一變者，何哉？兵與民雜居，則已於民之外別有所謂兵；兵民相對立，已失其民兵之性質矣。此更徵之明清之事而可明者也。

元、明兩朝之兵制，大畧相承。元制：總親兵者曰五衛，外有百千戶府，官皆世襲。此明內立五都督府，外立衛所之所由來也。元制，兵皆有籍，其法極嚴。明制亦然。元世祖既定中國，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河、洛、山東，據天下心腹，則以蒙古及探馬赤軍戍焉。此亦明制全國遍設衛所之所由來。抑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所猜防者為漢人；明以漢人驅逐胡元，所嚴防者為北族。故明人北邊設防之密，猶之元人中原駐兵之多也。元人於兵器極講究，故其兵有以技名者，如砲手軍、弩軍、水手軍是也。明代亦然，征安南得火器，特立神機營以肄習之。終明之世，視火器最重，諸邊皆不多發。又禁在外製造，以防漏洩。末年與清交戰，且藉歐洲教士之力，以製大砲焉。其沿江、沿海諸衛，造船規制，亦極詳密也。元、明兩代兵制之相承如此，即清代兵制，亦多模仿元、明、清之用旗兵駐防，即元世祖分兵鎮戍之意；其綠營之規制，則沿襲自明者也。綜觀歷代兵制，統馭之詳，兵籍之嚴，設防之密，械器之飭，無如元、明、清者。夫統馭詳，則將帥無自專之患；兵籍嚴，則行伍無缺額之虞；設防密，則不慮猝然之變；械器飭，則常有可恃之資。宜乎元、明、清三代，可以兵出而常勝；則以無道行之，亦必為天下

[165]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5。

之所畏矣。夷考其實，則大不然[166]。統馭之制雖詳，不免於上下相蒙，初不能收指臂相使之效也。名籍之制雖嚴，不免於名實不符，而明世之句軍，且大為民厲也。鎮戍之制雖密，然元不足以戢羣盜，明不能以禦外侮，而清末武昌起義，戡定全國，不逾二時，尤非前古之所有也。而區區械器之末，更無論矣。夫無兵之失，易見也，東漢、西晉是也。有兵而屯聚於一處，其失亦易見也，晚唐、北宋是也。有兵矣，兵散佈於各處，而不易為一人所擅矣；且令其耕以自養，而無糜餉之患矣；然而名存實亡，其失猶易見也，唐之府兵是也。若明之衛所，可謂盡得唐府兵之善，且終始能維持之，未至於名存而實亡者，然而卒亦未見其利，而徒見其弊者，何哉？君子觀於此，而知民兵既亡，兵制無一而可也。

蓋民兵之善，在其民皆為兵，而民之外別無所謂兵者；而其能耕以自食，則尚其次焉者也。天下之事，喜新鮮而惡陳腐。新鮮，則兵家所謂朝氣者也，陳腐，則兵家所謂暮氣者也。朝氣暮氣，不獨決機兩陣之時有之，即平時亦然。使軍隊發生暮氣者，莫如屯聚而不散。夫事，大積焉則必苑，苑則百弊生焉。集若干人而名之曰兵，而使之久久屯聚，則苑之謂也。其弊也，就事務言之，則所謂軍營積弊者是也。就精神言之，則所謂軍營習氣者是也。軍營積弊者，如兵有其額而無其人；或雖有其人，而實未嘗加以訓練，與白徒等；糧餉器械之資，則為將校所刻扣，所中飽，以致百事廢弛，而將亦無以令其下是也。軍營習氣者，兵之自視，畫然不同於凡人，而又無救民衛國之意。夫自視不同於凡人，則有自怙其力之心，倉卒將至於不可使令，有不復與齊民齒之意，約束之力稍懈，將至於無所不為。無救民衛國之誠，則視戰事初非其責，遇敵之強者，將逗撓而不進，望風而自潰。兵而至於如此，則已不可用矣。而推原其故，則皆由屯聚之久為之。蓋世間無論何項弊竇，皆須經歷若干時日，乃能發生。軍營積弊，中於其事，將校必任事稍久，乃能得作弊方法，乃能相勾結以行之。軍營習氣，生於其心，亦必在屯聚稍久之

[166]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6。

後。凡人之初任一事也，必視其事為可樂，謂由此誠可以建立功名，而竭誠以赴之[167]。及其任之既久，則厭倦之情生；厭倦之情生，則視其事無復意味；於是矜奮自強之心息，偷安求樂之念起；而種種不正當之事作，所謂習氣者成矣。然推原其朔，則皆由屯聚之久為之。故善治兵者，當使其兵散而弗聚；且得時時更執他業，而不專於為兵。散時多，聚時少，則一切弊竇不及生；得時時更執他業，則厭倦之情不萌，而習氣無由成也。此則非行民兵之制不可矣。世之致疑於民兵者，多謂其教練不如募兵之久，其技藝將不如募兵之精。然就已往之事觀之，則技之精，初不足償其氣之暮。自昔著名軍隊，往往其軍雖舊，其人則新。每戰之後，必加淘汰，即無戰事，亦必時時招取新兵，漸易其舊，非真恃數十年之老兵以赴敵也。美國參與歐戰，兵多臨時編成，而亦能制勝疆場，此即兵重氣而不重技之明驗矣。且戰鬥之技，必須在軍中教練者甚少。苟能獎率有方，寓軍令於內政，人人皆精兵之資格，未始不可於民間養成之。而不然者，即終歲屯聚不散，亦未必其技之遂精也，向之募兵是也。

獨是欲行民兵，必須推之以漸；且須先試之於若干地方，而後可及於全國。蓋天下之事，由人民自辦者，必能名實相符，且亦無他弊竇。若以官力強迫，則往往名不副實，或且至於騷擾。以中國土地之大，五方風氣之不齊，各階級人好惡之互異，斷非一時所能驟變。此而不論實際，但立一法，藉手於官吏或地方之豪健以行之，人民初不知為何事，絕無鼓舞奮發之心，徒以徵召誅求為苦；將不見其利，而適以召禍矣。故創辦之先，宜擇一二處利於推行之地先行之。試舉其例如東三省之民，積以胡匪為苦，未嘗不欲團結以自衛也；當道者顧靳不給以槍枝，使盜賊有所資，而良民不能抗，甚無謂也。誠能因其所欲，加以獎勸，予之援助；則數年之後，人人皆嫻於技；稍加訓練，即可成軍。不獨匪盜可絕，即論外患，亦有猛虎在山之勢矣。又如江浙兩省，長江以南浙江以北之民，實脆弱不可用，而淮北浙東之民，勇健剽悍，

[167]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7。

一宜於海，一宜於陸，誠能因勢而利導之，其功亦必較勝強行之於民風脆弱之地者萬萬也。語曰：善者因之，此之謂也。而尤要者，則政府只可獎率倡導，而必不可操刀代斫[168]。最好詳立計劃，凡當兵之技，除必須在軍營中教練者外，一切皆但懸其目，聽人民自習之，政府但加以考驗獎賞而已。萬勿遽立章制，藉手於官吏或地方豪健者以行之。待其懸格既久，人民之嫻於技者日多，乃就其地征兵，而以短期集而訓練之焉，此則無弊之術也。後世善言民兵之利者，莫如王荊公。荊公之於保甲，可謂推行極力。然其成效如何，則固無人敢言。民兵之制，元祐之後，固已廢壞，然即不壞，亦未必能復燕雲而禦女真，此則讀書者皆無異辭者也。然一觀當時人民所自為之事，如河北弓箭社者，則其成效可謂卓著。此何哉？一出人民自為，一由政府強迫也。蓋人民自為之事，非其所願欲，則必誠有所不得已。故其所立約束，皆能必行，而事不至於有名無實也。近今凡百事務，恒覺其弊多利少，即由皆非人民自為之故。凡事無益則有損，名實之間，不可不察也。

難者曰：民兵者，足以資守禦，而不利於攻戰者也。今之言非攻者，固亦未嘗謂守禦當廢。子之言，所主者，亦與時賢等耳；而又非非攻寢兵。何也？應之曰：吾之言，所以異於時賢者若有二：一則時賢持論偏者，幾謂用兵為今日不得已之舉；若世界太平，則兵竟可以不用。吾則謂世界進化，止有彼善於此，吾至善之可言，故謂將來之用兵，少於今日，可也；較今日為文明，可也；謂兵竟可以不用，則不敢作此說。夫持論須顧情實，不可徒作高論以自慰。謂世界可以太平，人類可止於至善，皆屬自欺之談；徒使人狂蕩而失其所守。謂兵竟可以不用，亦此類也。又其一，則持論不可膠固。非攻主守，固亦自有其理，然亦不可執之太過。墨子之非攻，特就事實立論，謂如當時之所謂攻者則不可耳，非謂一涉於攻，即為非理，前篇已言之，若執此二字為天經地義，但以攻守為是非之準，而其他一切不論，則又謬矣。此兩篇之作，所以當世之人，知兵終不能盡去，現今世界，去去兵之日尤遠；

---

[168] 呂思勉，《呂思勉論學叢稿》，18。

然以兵不能去，遂尤中國之將亡，辦屬過計之誨。俾談國是者，知目前所當趨向之鵠也。

(原刊《天籟報》滬江大學建校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26 年出版)

《呂思勉講中國文化》書摘

書名：呂思勉講中國文化

作者：呂思勉

出版地：北京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 年 06 月

緒論

歷史，究竟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究竟有甚麼用處呢？

這個問題，在略知學問的人，都會毫不遲疑地作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鑒。什麼叫做前車之鑒呢？他們又會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昔人所為而得，我可以奉為模範；如其失策，便當設法避免；這就是所謂「法戒」。這話驟聽似是，細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為同罷了。遠者且勿論。歐人東來以後，我們應付他的方法，何嘗不本於歷史上的經驗？其結果卻是如何呢？然則歷史是無用了麼？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嘗不敗。然則究竟如何是好呢？

歷史雖是記事之書，我們之所探求，則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眾事的，事則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沒有兩件真正相同的，執應付此事的方法，以應付彼事，自然要失敗。根據於包含眾事之理，以應付事實，就不至於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見的，捨事而求理，無有是處。所以我們求學，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

要應付一件事情，必須明白它的性質。明白之後，應付之術，就不求而

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質，又非先知期既往不可。一個人，為什麼成為這樣子的一個人？譬如久於官場的人，就有些官僚氣；世代經商的人，就有些市儈氣；向來讀書的人，就有些迂腐氣。難道他是生來如此的麼？無疑，是數十年作官、經商、讀書養成的。然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亦是如此了。中國的社會，為什麼不同於歐洲？歐洲的社會，為什麼不同於日本？習焉不察，則不以為意，細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極為深遠複雜了。然則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著呢，安能盡記？社會上每天所發生的事情，報紙所記載的，悉啻億兆京垓分之一[169]。一天的報紙，業已不可遍覽，何況積而至於 10 年、100 年、1,000 年、10,000 年呢？然則如何是好？須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並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統都知道了，記牢了。我，為什麼成為這樣一個我？反躬自省，總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嘗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統記牢呢？然則要明白社會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數記得，只要知道「使現社會成為現社會的事」就夠了。然而這又難了。任何一事一物，要詢問它的起源，我們現在，不知所對的很多。其所能對答的，又十之八九靠不住。然則我們安能本於既往，以說明現在呢？

這正是我們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學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學之所求，不外乎 1.搜求既往的事實 2.加以解釋 3.用以說明現社會 4.因以推測未來，而指是我們以進行的途徑。

往昔的歷史，是否能兼起這種任務呢？觀於借鑒於歷史以應付事實導致失敗者之多，無疑地是不能的。其失敗的原因安在呢？列舉起來，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於政治的。翻開二十五史來一看，所記的，全是些戰爭攻伐，在廟堂上的人所發的政令，以及這些人的傳記世系。昔人稱《左傳》為相斫書；近代的人稱二十四史為帝王的家譜；說雖過當，也不能謂其全無理由了。單看了這些事，能明白社會的所以然麼？以前的歷史，為什麼會有這種毛病呢？這是由於歷史是文明時代之物，而在文明時代，國

[169] 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4。

家業已出見，並成為活動的中心，常人只從表面上看，就認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會現象中最重要的一項了。其實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動，全靠社會做根底。社會，實在政治的背後，做了無數更廣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會，是斷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現在講歷史的人，都不但著重於政治，而要著重於文化。

何謂文化？向來狹義的解釋，只指學術技藝而言，其為不當，自無待論。說得廣的，又把一切人為的事，都包括於文化之中，然則動物何以沒有文化呢？須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異於動物的。其異點安在呢？凡動物，多能過外界的刺激而起反應，亦多能與外界相調適。然其與外界相調適，大抵出於本能，其力量極有限，而且永遠不過如此。人則不然。所以人所處的世界，與動物所處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1.由其有特異的腦筋，能想出種種法子。2.而其手和足的全然分開，能製造種種工具，以遂行其計劃。3.又有語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擴大的即為文字[170]。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傳之於彼；前人之所知，所能，並可以傳之於後。因而人的工作，不是個個從頭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續著做的。不像賽跑的人，從同一地點出發，卻像驛站上的驛夫，一個個連接著，向目的地進行。其所走的路線自然長，而後人所達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則文化，是因人有特異的稟賦，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環境的共業。動物也有進化的，但它的進化，除非改變其機體，以求與外界相適應，這是要靠遺傳上變異淘汰等作用，才能達到其目的的，自然非常遲慢。人則只須改變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對付事物的方法。我們身體的構造，絕無以異於野蠻人，而其控制環境的成績，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為生物進化，一為文化進化之故。人類學上，證明自冰期以後，人的體質，無大變化。埃及的屍體解剖，亦證明其身體構造，與現今的人相同。可見人類的進化，全是文化進化。恒人每以文化狀況，與民族能力，并為一談，實在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遺傳學家。論社會的進化，過於重視個

[170] 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文化》，5。

體的先天能力，也不免為此等俗見所累。至於有意誇張種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謂進化，將返於生物進化了。從理論上說，人的行為，也有許多來自機體，和動物無以異的，然亦無不被上文化的色彩。如飲食男女之事，即期最明顯之例。所以在理論上，雖不能將人類一切行為，都稱為文化行為，在事實上，則人類一切行為，凡無不與文化有關係。可見文化範圍的廣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會了。人類的行為，原於機體的，只是能力。其如何發揮此能力，則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這個問題，還非今日所能解決。研究歷史的人，即暫把這問題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亦得。因為目前分明放著多種不同的文化，有待於我們的各別研究。話雖如此說，研究一種文化的人，專埋頭於這一種文化，而於其餘的文化，概無所見，也是不對的。因為 1.各別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在。2.而世界上各種文化，交流互織，彼此互有關係，也確是事實。文化本是人類控制環境的工具，環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異。及其興起以後，因其能改造環境之故，愈使環境不同。人類遂在更不相同的環境中進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傳播的性質，這是毫無疑義的。此其原理，實因人類生而有求善之性，智。與相愛之情。仁。所以文化優的，常思推行其文化於文化相異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謀人類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為善而實不然的，強力推行，反致引起糾紛，甚或釀成大禍，宗教之傳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誤於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閉固拒的，皆別有原因，當視為例外。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織的原因。而人類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類的環境中，能有相類的文化。即使環境不同，亦只能改變其形式，而不能改變其原理。[171]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異，即因形式之異，可見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實言，自塞趨通，殆為進化無疑的軌轍。試觀我國，

[171] 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文化》，6。

自古代林立的部族，進而為較大的國家；再進而為更大的國家；再進而臻於統一；更進而與域外交通，開疆拓土，同化異民族；無非受這原理的支配。轉觀外國的歷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別的文化，當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無疑義的了。然則一提起文化，就該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國的歷史，亦將可融合為一。為什麼又有所謂國別史，以研究各別的文化呢？這是因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見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況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場。居中國而言中國，欲策將來的進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來的文化而論，亦必有其預備條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無從定其迎拒的方針的。所以我們在今日，欲了解中國史，固非兼通外國史不行，而中國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類以往的社會，似乎是一動一靜的。我們試看，任何一個社會，在以往，大都有個突飛猛進的時期。隔著一個時期，就停滯不進了。再閱若干時，又可以突飛猛進起來。已而復歸於停滯。如此更互不已。這是什麼理由？解釋的人，說節奏是人生的定律。個人如此，社會亦然。只能在遇見困難時，奮起而圖功，到認為滿足時，就要停滯下來了。社會在這時期就會本身無所發明；對於外來的，亦非消極的不肯接受，即積極的加以抗拒。世界無一息不變的。不論自然的和人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為濡滯之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應付。正和我們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推積，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亂的真原因。倘使當其漸變之時，隨時加以審查，加以修正，自然不至於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時的人，都以為這是限於一動一靜的定律，無可如何的。我則以為不然。這種說法，是由於把機體所生的現象，和超機現象，并為一談，致有此誤。須知就一個人而論，勞動之後，需要休息若干時；少年好動，老年好靜；都是無可如何之事。社會則不然。個體有老少之殊，而社會無之。個體活動之後，必繼之以休息，社會則可以這一部分動，那一部分靜。然則人因限於機體之故，對於外界，不能自強不息地為不斷的應付，正可藉社會的協力，

以彌補其缺憾。然則從前感覺的遲鈍，行為的濡滯，只是社會的病態。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會中人，不知遠慮，不能欲燭禍患；又如因階級對立尖銳，致寄生階級不顧大局的利害，不願改革等；都只可說是社會的病態。我們能矯正其病態，一治一亂的現象，自然可以不復存，而世界遂臻於郅治了。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最大的希望[172]。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序》，把歷史上的事實分為兩大類：一為理亂興亡，一為典章經制。這種說法，頗可代表從前史學家的見解。一部二十五史，拆開來，所謂紀傳，大部分是記載理亂興亡一類的事實的，志則以記載典章經制為主。表二者都有。理亂興亡一類的事實，是隨時發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經制，則為人預設之以待將來的，其性質較為持久。所以前者可稱為動的史實，後者可稱為靜的史實。史實確乎不外這兩類，但限其範圍於政治以內，則為免太狹了。須知文化的範圍，廣大無邊。兩間的現象，除1.屬於自然的 2.或雖出於生物，而純導原於機體的；一切都當包括在內。它綜合有形無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為，而且陶鑄人的思想。在一種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為，斷不能出於這個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講文化史，非把昔時的史料，大加擴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學課程草案，各學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無通史。後又改為通史，而注明當注重於文化。大約因為政治的現象，亦不可略，怕改為文化史之後，講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項之故，用意固甚周詳。然大學的中國通史，講授的時間，實在不多。若其編制仍與中學以下同，所講授者，勢必不免於重複。所以我現在，換一個體例。先就文化現象，分篇敘述，然後按時代加以綜合。我這一部書，取材頗經揀擇，說明亦力求顯豁。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啟示。以我之淺學，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

[172] 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文化》，7。

禍籌車之誚，但總是我的一個希望罷了[173]。

《呂思勉講思想史》書摘
書名：呂思勉講思想史
作者：呂思勉
出版地：南京
出版社：鳳凰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 年 11 月

史家宗旨今昔異同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於今人者，大端有三：

偏重政治

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國家設立。其易於偏重政治者，勢也。人類之作事，恒有其惰性，前人創行焉，則後人率循而不敢越。抑不僅此，古代國小而俗樸，舉一國惟在上者之馬首是瞻，斯時廟堂之政令，蓋誠為舉國之樞機。即在後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強制在下者，使之變易其外形，所及廣而收效宏。蓋無逾於政治則喋喋不休也。然政治之力，雖能改易舉國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僅及外形而止。況於國大民眾，中樞之命令，不能遍及，社會程度日高，一心聽令又非古昔之比，雖欲變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試觀近代，政治轉移社會之力，較機械為何如乎？

[173] 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文化》，8。

偏重英雄

此由古代事權，恒操於一二人之手之故，其實英雄全恃憑借，亦全恃命運，試以身所接構之人，較其成功者與敗績者，其才力相去，初不甚遠可知。又英雄之稱，實由庸眾所賜而庸眾識力不及，往往以矯誣僥倖之徒為英雄，而真英雄轉非所識。試觀往史，有眾所唾罵，或以無足重輕，而今聲價日增者。亦有眾所歸美之人，今斷覺其一錢不值者。而先知先覺，眼光過於遠大，與恒人相去太遠者，尤易為世所繆辱。驗諸并世，此等情形，尤隨在可見，特人莫之察耳，以莫能察者之多，而庸眾之程度可見矣。庸眾之程度可見，而其所評定之英雄可知矣。即謂英雄之成功，非全僥倖，然必能利用事勢，乃能成功，則確不可易。時勢造英雄，盈天地間皆是。英雄造時勢固非無其事，然皆世所淡漠視之者也。故真能促進社會之過程者，皆非世所謂英雄，而世所謂英雄，則皆隨波逐流之徒也。

偏重軍事

此由外觀之興亡，每因軍事而起，其實國之興亡，由於戰之勝敗，而戰之勝敗，初不在於勝敗之時，事至習見，理亦易明[174]。時至今日，本有取人之國而不用兵者，即在淺演之世，勝負專決於兵，亦不過能懾服之，使不我抗而已。真欲同化他族，使之泯然無迹，亦必別有設施，我族同化異族之事，即其佳證也。

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軍事，三者弊亦相因，以政治軍事，古多合而為一。而握有此權者，苟遭際時會，恒易有所成就，而為世人目為英雄也。此蓋往史最大之弊。自此以外，猶有五焉：

[174] 呂思勉，《呂思勉講思想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138。

獎勵道德

其義又有二，一以維持社會之正義。如往史之講褒貶，重激揚是。一資為立身之模範，如以善人為法，惡人為戒是也。

激勵愛國愛種族

今日之史，猶未能合全世界為一。乙部大宗，大抵一國家一民族之史也。同族同國之人，其相親愛，本以異於異族異國，況於今日種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為他族所征服，往往為之奴隸牛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圖自保，又不能無國家為利器乎？況於古代偏狹之見，又有留詒至今，未能湔除者？愛國愛族，誠未嘗不可提倡，然蔽於偏見，致失史事之真，則繆矣。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繆誤，蓋未易枚舉，今日讀之，未見不啞然失笑者也。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為矯誣，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為者，則尤不足道矣。

藉以傳播神教

教徒所作史恒有之。試讀《蒙古源流考》，觀其妄援吐蕃，以為有元帝室之祖。又試讀梁任公佛教初輸入一篇，則見白馬馱經之說。本道教徒之讕言，而其後輾轉附會，轉用以詆毀道教，即可知此等史迹，無一可信。然至今日，此等事仍不能免。往者梁任公撰克倫威爾傳，稱揚其革命之功，基督舊教所出匯報，乃務反之。又今日奉佛之人，喜援佛經之寓言，侈陳佛之靈迹。信孔教者，亦喜引讖緯怪說，以見孔子之殊異於人。此皆予所親見者也。其智與撰《蒙古源流考》，造白馬馱經之說者何異？此等事，在今世，誠不甚多，有之亦不足惑眾。然在往昔，則惑世誣民甚深。並有更無正史，欲考行事，惟有求之教中經典者矣。中國信教，不如外國之深。教徒奸亂歷史亦不如外國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帶迷信性質。如劉知幾《疑古》、《惑經》兩偏，往昔論者，多詆為非聖無法是也。

偏重生計

此弊舊日無之，祗病視之過輕耳[175]。今之過信唯物史觀者，則頗有此弊，史事因果至為繁複，誠有如釋家所謂帝網重重者，偏舉一端，縱極重要，必非真相。況於戴藍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藍。戴黃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黃。意有偏主，讀一切書，觀一切事，皆若足為吾說之證，實則未足深信乎？孔子之講大同，老子之慕郅治，所慨想者，實皆隆古部落共產之世。今日社會學者所慨慕，夫豈古人所不知，然終不謂生計制度一變，天下遂可臻於大同郅治。以社會之事，經緯萬端，固非偏舉一端，所可概也。

偏重文學

史出源出於傳述，傳述之語，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動人。而事之真髓因之而隱。荷馬史詩，本類唱本者而無論矣。即學者所傳，亦多不免此弊。《管子》述桓公之威，北懾離枝，西臣大夏。夫離枝即後世之鮮卑，大夏極近，亦當在今山西境。齊桓盟會，晉獻訖未嘗與，獻公死而國亂，齊桓亦未能正，安能暴師徒以征并北之遠夷。《左氏》謂山戎病燕，不過在北平境，《公羊》謂其旗穫而過魯，則并在今山東境矣，安能遠及長城之外乎？此由口耳相傳，茲不諦。先秦兩漢，多有此病，魏晉而降，務華飾而失真，趙宋以還，好學古而不切，近世文字，雖稍平實，然好講史法，務求簡潔雅馴，失實仍不少也。

以上所舉，皆史家之弊。至於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兒童不能了解，曲說史事，致失真相者。今日粗俗之無之輩，以及耳食之徒，論三國事，無不誤以演義為史實者，可知通俗教育，影響之大。偏重之弊，厥有三端：

不重之事，易於漏略。

所重之事，易於擴大。

---

[175] 呂思勉，《呂思勉講思想史》，139。

原因結果，易於誤認[176]。

此等理，原非古人所不知，然於異時地之情形，知之不悉，及其論事，終不免以異時異地之事，即在此時此地境界之中，猶評外國戲劇者，設想其即在中國舞臺之上，其言必無一得當矣。職是故，今日史家之先務，遂與昔時大異，彼其重情狀，不重事實，非吐棄事實也。其所求者，皆足以考證一時一地社會情形之時云爾。社會之情形既明，而一切事實，皆不煩言而解矣。求明社會情形之事實如何？曰有二：

重恆人

諺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斯固然，然不知兵之勇怯，亦安知將之良否？讀前所論韓信戚繼光之事可見矣。故英雄猶匠人，其所憑藉之社會猶土木，匠人固不能成室，而匠人技藝之優劣，亦視其運用土木如何耳。成一時一地之情形者，恒人之飲食男女，日用行習也。英雄猶浮屠之頂，為眾所著見，不待考而明，恒人猶全浮屠之磚石，易見忽略，故非詳加考察不可也。

重恆事，恆事者，日常瑣屑之事

亦易見忽略，然實為大事之基。鮮卑者，東胡之裔，東胡蓋古之山戎也。方其未強盛時，齊桓伐之而捷，秦開卻之而克，至匈奴冒頓攻之，遂奔北逃竄，一若絕無能為者。然至檀石槐、軻比能，遂方制萬里。使邊郡之士夫，為之旰食，何哉？蔡邕之言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馬利疾，過於匈奴。證以金室初興，厚植以市商人所攜之兵甲，滿清猾夏，實起撫順之互市。而鮮卑強盛之原因，可想見矣。寧城下通胡市，後書之記此，固以見漢撫馭之略，非以著鮮卑強盛之由，而吾儕連類鈎考，乃能別有所得。知風化乃知山崩，地表之變動，海岸線之升

[176] 呂思勉，《呂思勉講思想史》，140。

降，故不讓火山之爆發，洪澤湖之陷落。不知平時，固無由知革命也[177]。

史學演進趨勢

史學演進可分四期：

覺現象有特異者，則從而記之，史之緣起則然也。

人智愈進，則現象之足資研究者愈多，所欲記載者乃愈廣，太史公欲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其機即已如此。至於後世，而其範圍亦愈式廓矣。

凡事皆有其惰力，後世史家，盡有沿襲前人，不求真是者，章實齋所譏，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者也。然以大體言之，所搜求之範圍，總較前人為廣，即門類不增，其所搜輯，亦較前人為詳。《通志・總序》曰：臣今總天下之學術，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即此思想之代表也。

然生有涯而知無涯，舉凡足資研究之現象，悉羅而致之，卒非人之才力所勘也，於是苦史籍之繁，而欲為之提要鉤玄者出焉。

鄭樵即已有此思想，至章學誠而其說大昌。樵謂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成一家之言。學誠分比次與獨斷為二類，記注與著述為二事，謂比次之書，僅供獨斷之取裁，考索之案據。事萬變而不窮，史文當屈曲而適如其事。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即此等思想之代表也。然史籍之委積，既苦其研之不可勝研矣；更欲以一人之力，提其要而鉤其玄，云胡可得？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涉之博者必不精，將見所棄取者，無一不失當耳。

故至近世，而史學之趨向又變。

史學趨向之更新，蓋受科學之賜，人智愈進，則覺現象之足資研究者愈

[177] 呂思勉，《呂思勉講思想史》，142。

多，而所入愈深，則其所能研究者亦愈少。學問之分科，蓋出於事勢之自然，原不自近世始；然分析之密，研究之精，實至近世而盛，分科研究之理，亦至近世而益明也。學問至今日，不但非分科研究不能精，其所取資，並非專門研究者不能解。於是史學亦隨他種學問之進步，而分析為若干門，以成各種專門史焉。然欲洞明社會之所以然，又非偏據一端者所能，則又不得不合專門史而為普通史，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觀其通，此則今日史學之趨向也。恒人之見，每以過而不留者為事，常存可驗者為物，研究事理者為社會科學，研究物理者為自然科學，此亦恒人之見耳。宇宙惟一，原不可分，學問之分科，不過圖研究之利便，既畫宇宙現象之一部，定為一科而研究之，則凡此類現象，不論其為一去無迹，稍縱即逝，與哲存而不覺其變動者，皆當有事焉[178]。此各種科學，所以無不有其歷史，亦即歷史之所以不容不分科也。然則史不將為他種科學分割以盡乎？是又不然，宇宙本一，畫現象之一部而研究之，固各有其理，合若干科而統觀之，又自有其理。此莊子所謂丘里之言，初非如三加三為六，六無所餘於兩三之外也。故普通史之於專門史，猶哲學之於科學。發明一種原理，科學之所有事也；合諸種原理而發明一概括之原理，哲學之所有事也。就社會一種現象，而闡明其所以然，專門史所有事也。合各種現象，而闡明全社會之所以然，普通史之所有事也。各種學問，無不相資，亦無不各有其理，交錯紛紜，雖非獨存，亦不相礙，所謂帝網重重也。且專門家於他事多疏，其闕誤，恒不能不待觀其會通者之補正，史學又安得為他科學所分割乎？有相得而益彰耳。然則將一切史籍，悉行看作材料，本現今科學之理，研究之以成各種專門史，更合之而成一普通史，則今日史學之趨向也。

史學能否成為科學，此為最大疑問。史學與自然科學之異有四：

自然現象，異時而皆同，故可謂業已完具。史事則不然，世界苟無末日，無論何事，皆可謂尚未告終。

---

[178] 呂思勉，《呂思勉講思想史》，155。

自然現象，異地而皆同，故歐洲人發明之化學、物理學，推之亞非澳美而皆準。史事則不然，所謂同，皆察之不精耳。苟精察之，未有兩事真相同者也。然則史學之當研究者無限，吾儕今日所知史事誠極少，然史事即可遍知，亦斷無此精力盡知之也。

自然現象既異時異地而皆同，則已往之現象，不難推知。而材料無虞其散佚。史事則又不然，假使地球之有人類，為 50 萬年，則所之彌少矣。而其材料，較諸自然科學所得，其確實與否，又不可以道里計也。

自然科學所研究之物，皆無生命，故因果易知。史事則正相反，經驗不足恃，求精確必於實驗，此治科學者之公言。然實驗則斷不能施諸史事者也。由此言之，欲史學成為科學，殆不可得。然此皆一切社會科學所共，非史學所獨也。社會現象所以異於自然現象者，曰：有生命則有自由，然其自由絕非無限。況自然現象之單簡，亦在實驗中則然耳。就自然界而觀之，亦何嘗不複雜。社會現象，割截一部而研究之，固不如自然科學之易，而亦非遂無可為。若論所知之少，社會科學誠不容諱，自然科學亦何嘗不然。即如地質學，其所得之材料亦何嘗不破碎邪？故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精確不精確，乃程度之差，非性質之異，史學亦社會科學之一，固不能謂其非科學也[179]。

七、趨新與守舊

呂思勉的讀史箚記有類乾嘉箚記體著作，其中部分曾編輯成書。惟已刊箚記均有程度不同之刪節。200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呂思勉讀史箚記》增訂本，匯總呂思勉全部已刊和未刊箚記 762 條，百餘萬字，在閱讀過程中，筆者注意到呂思勉的讀史箚記有類顧炎武《日知錄》，各條雖長短有間，惟皆甚有所見，發前人之所未發。

[179] 呂思勉，《呂思勉講思想史》，156。

八、結論

九、進度報告

(一)執行進度

田野調查於 2013 年 6 月前往呂思勉最後任教的華東師範大學蒐集相關資料，並赴常州呂家祖屋考察呂思勉留下之藏書，以藏書內容索引其史學之本源。

2013 年擬前往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蒐集資料，補足缺佚之史料。

十、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研究報告擬以專書形式撰寫，暫訂《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為題，並將視實際研究修訂書名。大綱初擬如下：

一、引論
二、現代中國史學的傳統與創新
三、治史的材料與方法
四、通史新義
五、斷代為史

六、多主題的專著

七、趨新與守舊

八、結論

除引論、結論外，在各章完成時，將視情況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在研究報告完成後，以 1- 2 年的時間增補修訂，預計於 2016 年或 2017 年以專書形式出版。

本文為第一年度結案報告，引論已接近完成，其餘章節詳略不一，部分已撰寫局部初稿，部分僅為讀書筆記或摘要，尚待進一步撰寫。

十一、 徵引書目

(一)專書(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1.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 Schneider Laurence A.,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
3.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5.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6.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7.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
8. 呂思勉，《三國史話》，北京：中華書局，2009。
9. 呂思勉，《中國文化史六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12. 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3. 呂思勉，《中國階級制度小史》，上海：中山書局，1929。
14. 呂思勉，《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十六講》，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
15. 呂思勉，《中國歷代興衰十六講》，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
16. 呂思勉，《中華民族源流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17. 呂思勉，《文字學四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18. 呂思勉，《日俄戰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9. 呂思勉，《史通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20. 呂思勉，《史學四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1.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2. 呂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3.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24. 呂思勉，《呂思勉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9。
25. 呂思勉，《呂思勉說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6. 呂思勉，《呂思勉遺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27. 呂思勉，《呂思勉講中國史》，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28. 呂思勉，《呂思勉讀史箚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9. 呂思勉，《呂著中小學教本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0. 呂思勉，《呂著中國近代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31.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32. 呂思勉，《呂著史學與史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33.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4. 呂思勉，《為學十六法》，北京：中華書局，2007。
35.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6. 呂思勉，《理學綱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37.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8. 呂思勉，《經子題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9. 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40. 呂思勉，《歷史研究法》，臺北：五南出版社，1995。
41. 呂思勉，《燕石札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42. 呂思勉，《燕石續札》，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
43. 李永圻(編)，《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
44.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
45.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46. 俞振基(編著)，《蒿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1996。
47. 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48. 張耕華，《呂思勉：史學大師》，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49.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50.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51.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52. 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2。

53. 陳寅恪(著)、陳美延(編)，《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2。
54.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
55. 陶希聖，《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
56.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57.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1-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58.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59.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60.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
61. 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62.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6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蘭臺出版社，2000。
64. 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6.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

(二)論文

1. 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5-331.
2.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3. 王信凱，〈柳詒徵研究——一個學術文化史個案分析〉，宜蘭：佛光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4. 王婷婷，〈呂思勉通史編纂的成就及其價值〉，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5. 何周，〈淺論呂思勉史學思想的幾個問題〉，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7。
6. 李波，〈呂思勉與《白話本國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7.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8. 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25-76。
9. 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10.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05): 475-489。
11.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1975。
12. 袁振堂，〈呂思勉的史學成就及史學思想述論〉，山東：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13. 區志堅，〈民國時期的「南高」史學(1915-1931)：以柳詒徵及其學生為中心〉，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1。
14. 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504。
15. 張耕華，〈呂思勉：一位被冷落的史學大師——寫在《呂思勉文集》出版之際〉，《光明日報》，2006年2月13日。
16.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17. 陳輝娟，〈二十世紀20-40年代中國歷史學家對中國宗族的研究：以呂思勉、陶希聖的研究為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18. 彭明輝，〈現代中國南方學術網絡的初始(1911-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9(臺北，2008.05): 51-84。
19. 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讀書》，9(北京，1995): 64-72。
20.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21.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22.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23.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4(北京，2000): 151-167。

易地研究報告

計畫主持人彭明輝前往呂思勉最後任教的華東師範大學蒐集相關資料，並至上海圖書館蒐集呂思勉著作之早期版本，收獲甚豐。並赴常州呂家祖屋考察呂思勉留下之藏書，以藏書內容索引其史學之本源。呂思勉紀念館藏有其手稿、用印、藏書，所獲甚夥。赴華東師範大學蒐集資料期間，蒙該校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茅海建教授協助，歷史系張耕華教授、胡逢祥教授提供相關資料，甚為順利。赴廣州中山大學訪查資料，蒙中山大學歷史系桑兵教授協助，獲得該校圖書所藏呂思勉資料，桑兵教授並提供個人所藏，收獲甚豐。田野調查所得資料，已陸續運用於研究。

易地研究報告

計畫主持人彭明輝前往呂思勉最後任教的華東師範大學蒐集相關資料，並至上海圖書館蒐集呂思勉著作之早期版本，收獲甚豐。並赴常州呂家祖屋考察呂思勉留下之藏書，以藏書內容索引其史學之本源。呂思勉紀念館藏有其手稿、用印、藏書，所獲甚夥。赴華東師範大學蒐集資料期間，蒙該校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茅海建教授協助，歷史系張耕華教授、胡逢祥教授提供相關資料，甚為順利。赴廣州中山大學訪查資料，蒙中山大學歷史系桑兵教授協助，獲得該校圖書所藏呂思勉資料，桑兵教授並提供個人所藏，收獲甚豐。田野調查所得資料，已陸續運用於研究。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28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
	計畫主持人: 彭明輝
	計畫編號: 101-2410-H-004-130- 學門領域: 中國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彭明輝	計畫編號：101-2410-H-004-130-
計畫名稱：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1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1	100%		專書中之兩章。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1	1	100%	人次	1
		博士生	1	1	100%		1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計畫完成後擬撰寫專書。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教處計畫加填項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有關現代中國史學的研究，主流學統無疑較受研究者重視，所謂主流學統係指新派學者，本研究計畫以較不受青睞的非主流學者為對象，冀期為建構完整的現代中國史學的圖像略盡薄之力。一項專題研究或一本專書的完成，亦唯整體現代中國史學圖像的一小塊磚瓦，不敢說能有若何重大貢獻，或許只是一方小小的踏腳石，供後來研究者墊足之用。

本計畫為筆者研究現代中國史學的第 4 部分，大綱暫擬如下：

專書暫擬以《呂思勉史學的趨新與守舊》為題，並將視實際研究修訂書名。

一、引論

二、現代中國史學的傳統與創新

三、治史的材料與方法

四、通史與斷代史

五、多主題的專著

六、趨新與守舊

七、結論

除引論、結論外，在各章完成時，將視情況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在研究報告完成後，以 1-2 年的時間增補修訂，預計於 2015 年或 2016 年以專書形式出版。